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輯印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附汪先生親撰之廖仲愷先傳生略

民國十五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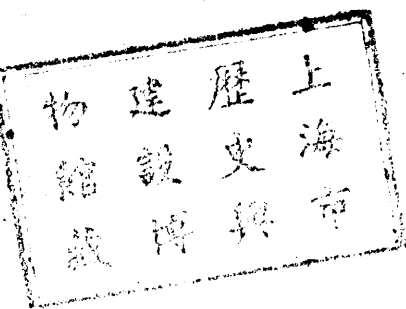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214 57358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目錄

- 一、「平和」！「奮鬥」！！「救中國」!!!
- 二、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 三、「國民革命」之意義
- 四、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 五、悼廖仲愷同志勗諸同志
- 六、革命的分⼦應有之決心
- 七、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 八、十四年十月二日在陸軍軍官學校就職黨代表之演說
- 九、什麼是反革命
- 十、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1004051

十一、在國民政府特別黨部之演說

十二、歡迎懇親團

十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孫文主義學會成立會之演說

十四、在二次代表大會對於接受總理遺囑案之報告

附錄

汪先生親撰廖仲愷先生傳略

「平和」！「奮鬪」！！「救中國」!!!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追悼孫總理大會)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潤了，一種微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平和」！「奮鬪」！「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裏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平和」！「奮鬪」！「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釋，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釋的說出來的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為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却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真真是他

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平和」與「奮鬥」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卻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平和」；孫先生的學生「奮鬥」，為什麼呢？是為「平和」而「奮鬥」。孫先生平日為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為公」四字，這便是平和的真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平和，是如此的，祈求平和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鬥。三民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平和是仁者的心事，奮鬥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老子說「慈故能勇」，都是這個道理。為平和而奮鬥，以奮鬥求平和。平和為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鬥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孫先生呢？「平和」！「奮鬥」！「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頭舉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平和」「奮鬥」「救中國」做去。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汕頭建國粵軍總司令部行營舉行第三次孫大元帥紀念週，時汪精衛先生適在汕頭參與祭禮，並同衆演說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兄弟由北京來得參與這裏第三次的週祭，承總司令的囑咐，要兄弟向諸君說幾句話，兄弟謹把這一次到北京去的經過，簡單報告。

兄弟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隨大帥自廣州出發，十七日到上海，大元帥決定自己率領幾位同志，繞道日本以赴天津，命兄弟先行入京，並在津會面，及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兄弟接著，這時候大元帥已發病了。但是大元帥還不肯休息，雖然病臥在牀，而裁答函電，接見重要同志及賓客，仍是每日不斷，至三十一日入京以後，病勢日見沉重，便不能躬親庶務了。一月二十六日入協和醫院受手術後，以至於三月十二日易簣，神明雖然始終不亂，但病勢至此，不能再以別樣事情，擾其心曲。故此這幾個月內，實沒有什麼事可以話告，這是實可痛心的。

這一次大元帥北行之目的，曾經鄭重宣言，一是開國民會議，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諸君知道，開國民會議，是打倒軍閥的第一着手，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第一着手。開國民會議，國人是沒有疑問，廢除不平等條約，國人便有些疑問，似乎是外交問題，總要在內政清明之後，方纔有解決的希望。如今內政還沒有整理，便驟然說廢除不平等條約，似乎太早，殊不知內政所以不能清明，是因為軍閥把持，而軍閥所以能把持內政，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在後擁護。徵之往事，袁世凱所以能帝制自為，是因為癸丑之役，能打倒國民黨，而其所以能打倒國民黨，是因為得了五國銀行團二萬萬五千萬元的大借款，袁世凱得了這一批大借款，內用以充實自己的軍隊，外用以收買一般變節的國民黨員和懷貳心的國民黨軍

隊，所以釀成癸丑之役，以爲帝制自爲的張本。以後如馮國璋徐世昌曹琨之流，每逢要做反革命的事業，和國民黨作戰，沒有一次不求助於帝國主義者，而帝國主義者沒有一次不助他。所以在反革命的方面，他特著有帝國主義者者幫助，便全然不顧國民反對，將帝國主義者所借給款項，擴充軍隊，把持政治，以與國民革命爲敵。而在革命的方面，同時向軍閥及帝國主義作戰，已經吃力，再加以帝國主義者爲軍閥作揄揚，向國民作種種誣譏，淆惑國民之視聽，以致國民革命之氣勢，爲之阻滯不多。十四年來，中華民國沒有建設得好，甚至十二年間廣東處於四面受敵之地位，都是這一種原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軍閥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國亡無日，還說什麼內政清明，豈不是夢想？所以打倒帝國主義，不但是中國對外自由獨立的必要工作，這些道理從前國內人士往往沒有研究清楚，自從大元帥苦心提倡開導之後，方纔漸漸的明白。

開國民會議是奪取軍閥所把持着的政權，還之國民。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毀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施行侵略的武器。故此大元帥的主張，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不願聞的。當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的時候，天津的法領事，竟不許中國各界人士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開會歡迎，還揚言不許大元帥通過法租界。這可說與大元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針鋒相對。而中國的官僚，反以爲這是大元帥不善外交所致，這是何等夢囈？過了幾日之後，京津一帶，紛紛傳說，駐在北京的外交團，要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大元帥聽得，極爲注意。適值交通總長葉恭綽和善後會議籌備主任許世英來見，大元帥詢知實有其

事，當時極爲震怒。諸君啊，大元帥所患的肝臟重病，據各國醫生所說，現時世界還沒有治這病的藥，我們不敢說這一番震怒，是大元帥致死的根由，然總是大元帥添病及促其生命的一個原因，這是我們所永永不會忘記的。當時兄弟因爲大元帥震怒，極力勸止，並自任與葉許兩位切實商量，葉許兩位已經答應向臨時執政商量補救方法。一是在答覆照會裏頭，聲明政府同意於國民修正條約之要求。二是外交次長於答覆照會遞交時，口頭聲明執政政府對於孫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完全同意，然其結果，答覆照會裏頭，僅僅說了一句含糊的話。至於口頭聲明便至今也杳無聲息，尊重不平等條約，果然做了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了。須知道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者加於中國的一條鐵練。自從滿洲政府套上了這條鐵練之後，至今總沒有掙斷；而且每逢北京政府首領登台的時候，各個帝國主義者，必然要使他認識不平等條約之天經地義。例如民國八月的時候，駐京英公使朱爾典向袁世凱提出西藏獨立的要求，並以之爲承認民國的交換條件，我們想想甲午的中日戰爭，便是因爲日本要求高麗獨立而起，那時候中國尙不恤出於一戰，而袁世凱竟以西藏獨立，爲取得英國承認他在民國的地位之交換條件。這是何等的勾當？又如民國十二年冬間，曹琨賄選總統的時候，駐京外交團，便以曹琨承認臨城案爲外交團承認賄選之交換條件，曹琨便也連忙答應，這又是何等勾當？帝國主義者於他們登台的時候，兜頭的給他們一條鐵練。他們爲怯著場台的緣故，便低頭受之不辭，早已成了北京政府的老例了。大元帥北行，以廢除不平等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受了一大挫折了。至於開國民會議呢，我們看了一月十七日大元帥覆臨時執政的復電便可知

白，依大元帥在廣州臨時時的宣言，是以預備會議產生國民會議的。如今徐電連預備會議的名稱也不爭執，只有臨時執政肯於善後會議之內容納現代實業團體，商會，農會，教育會，各大學生聯合會，軍人，政黨等代表，使國內各種職業團體得善後會議之內，主張意見，大元帥便不惜犧牲預備會議的名稱，以贊成善後會議。這樣的讓步，已可謂到極點了。然而臨時執政對於這樣的讓步還不能滿意，只羅致一些不完全的職業團體代表來做什麼專門委員，且有發言權。無表決權，和上海工部局的華人顧問一樣。主權在民的意味，消失無餘。大元帥北行，以開國民會議為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又受了一大挫折了。

諸君啊！大元帥北行目的，受如此挫折，是在大元帥的意中呀，還是在大元帥的意外呢？依兄弟愚見，這是在大元帥意中的。大元帥於十一月十七日抵上海後，曾召集上海新聞界中人於英利愛路二十九號寓廬，宣布北行目的，並且說道「我抱了這樣目的而北上，我知道是會危險的，我只要國民明白，我便什麼都不署，我便什麼都不怕。」可見北行目的之受如此挫折，實是在大元帥的意中。然而國民的明白也在大元帥的意中。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元帥入京，市民歡迎以十萬計，三月二十日以後大元帥靈柩停放中央公園內，市民來祭者前後數十萬人。他們不是來看熱鬧，也不是無意識的崇拜。其中大部分的青年學生軍人工人，都認識大元帥的主義，至少也欽敬大元帥主張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用心。他們的意思表示，都可以為證，兄弟敢說中國國民黨革命的氣勢，已在北方開展了。

當北方革命氣勢開展的時候，正有賴於大元帥之領導統率，而大元帥溘然逝去，這豈但

是北方人民的不幸，是中國的不幸，也就是大元帥的遺憾。所以大元帥在遺囑上，將生平未了的事，付託於後死的同志。除了遺囑所載之外，在三月十一日夜，一息奄奄的時候，反來覆去的，只念著「和平，奮鬥，救中國」三句話，真是「一息尚存，不肯少懈」，令人悲傷感激，至於無極！「救中國」是大元帥一生的志願，「和平」是中國將來的光明，「奮鬥」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和平是奮鬥的目的，奮鬥是求和平的手段，因為和平兩個字，不是偷生苟活，也不是醉生夢死，人類不互助不得謂之和，不平等不得謂之平。互助和平兩個字，惟有互助平等方纔是真解。在這樣的不平等社會裏頭，不用奮鬥的方法，不能使不平者歸於平，既不能平，和便無從說起。大元帥一生是一個極仁慈愷惻的人，同時是一個極勇敢強毅的人；惟其大仁是以大勇，故此和平奮鬥，是大元帥一生救中國的大本領。

兄弟常常聽得國裏頭的人，有些將大元帥比美國的華盛頓，有些將大元帥比俄國的列寧。以事功來論，中國國民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所以大元帥比之華盛頓列寧為有遺憾。就環境來論，大元帥所處的艱難困苦，尚非華盛頓列寧可比。美國獨立戰是華盛頓統率，而美國人民的獨立思想運動，醞釀日久，非華盛頓所提倡的。俄國革命運動，將及百年，至列寧而集大成。就列寧的成功看來，實是空前的偉大。然而列寧有深長的俄國革命歷史來做根據，這是他成功偉大的一個原因。至於大元帥呢，四十年前提倡中國革命，由播種而萌芽，而抽條，而發葉，都是他一手造成。在他人當這環境，只能做一些革命思想運動，而他却已從事於革命實行。這已是在歷史上找不著前例的，揆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例，他當然只能

一辛勤種樹的人，中國國民革命將來定然是成功的，可惜大元帥不及見了。當大元帥病勢沉篤，自知不起的時候，對於革命前途。抱著無限望念，對於同志之能否繼續奮鬥，抱著無限掛念。在這時候東江戰事接連不斷的捷報，實能使孫大元帥痛苦中得著些安慰。我們同志實在感激總司令，及各位將士的努力。我們同志更盼望總司令及各位將士，早日成功，俾大帥遺囑上所望的一一實現。

「國民革命」之意義

（汪先生九月六日在黃埔陸軍軍

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學生會演辭）

本校自從蔣校長廖黨代表奉總理命創立以來，爲時不過年餘，第一期的畢業學生，已經隨着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黨軍，於今年東江之戰，廣州附近之戰，掃除反革命的勢力，最近又在廣州市鎮壓反革命派，解除反革命派軍隊武裝，成績燦然。第二期的學生，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參加上述各項工作，於今已告畢業，此後研究時代，告一段落，擔負責任時代，於焉開始，且日以加重，必能繼續上述各項工作，而使之擴大。兄弟對於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的前途，實在馨香以祝。

目前應該繼續工作，第一是統一廣東。黨軍的目的，在全國而不在一省，但依工作的次序，非先將廣東統一，決不能着手於統一全國。證之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伐軍深入江西，連

戰皆捷，而反革命派，在廣州蠢動，爲北伐軍後顧之憂，以致功敗垂成，可見廣東若不統一，是不能輕易進取的。以黨軍前此的成績而論，深信統一廣東的事業，必能由黨軍做成，而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參加此項事業，也必能和第一期畢業學生諸君一樣的勝任愉快，此可爲諸君預賀的。

剛纔我們同在一起，恭聽總理的遺囑，遺囑的頭一句話，是國民革命。現在軍事委員會，定各軍統一的名稱，也是國民革命。兄弟想今日如果說些泛常的話，不如將國民革命四字，提出來討論一下，作爲贈言，較爲有益。

國民革命，是整個的名詞，他的定義，總理在遺囑中，已解釋明白了。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何以不自由平等呢？因爲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于中國呢？是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的唯一目標，便是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有疑議。帝國主義不倒，中國的平等自由，無從恢復，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建設，都無從說起；所以中國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實在是卑無高論，凡是覺悟的國民，都能做到的。然而以前國民革命的時候，往往於一二重要條件，所有忽略，以致留爲後日的大患。例如十八世紀時候，歐洲各國，紛起革命，而其結果，將革命所得的幸福，歸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甚至取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樣的國民革命，不止於世界無益有損，即於自己的國家，也未見有益。試看歐洲各國，最近社會革命的現象，及歐洲大戰時代的殺戮破壞，便可以明白。所以今日的國民革命，應

該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有一種特色，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因為有三民主義為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擔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就部份來說，是中國的，就全體來說，是世界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有此二特色，所以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以上二特色，凡讀過總理三民主義的，都可以領略得到，而總理在遺囑上，更有簡單明瞭的說明。所謂喚『起民衆』，便是第一特色之存在。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第二特色之存在。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此目的之方法，在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鬪。

什麼叫做喚起民衆呢？民衆的最大部分，是農民工人，在未喚起的時候，農民工人，絕不知道國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喚起以後，則農民工人必成為國民革命之最大勢力。因為農民工人的本身利益，與帝國主義是絕對衝突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帝國主義之要殖民地，其最大目的，無非掠奪農民血汗得來的農產物，以為原料，掠奪工人血汗得來的製造品，以為商品，所以有了農民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至於商人，普通看來，似乎與農民

工人利益相反。其實在殖民地次殖民國的商人，除買辦階級外，其本身利益，也和農民工人一樣，與帝國主義，絕對衝突，絕對不能妥協。因為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商人獨能解除，而且商人所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之痛苦，較一般人民，更為深切。帝國主義資本之壓迫，如金融操縱等等，政治勢力之壓迫，如關稅協定等等，皆是使商人永無獨立發展之希望，故商人於喚起以後，必能和農民工人一樣，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知識階級，他所受的經濟之壓迫，沒有農民工人商人這樣痛切，那就全仗他良心的壓迫了。國民革命時代，最要緊的，是集合全民衆的勢力，向於一個目的而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這個本是自然的，因為他們所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們的需要也相同，不過不經喚起，便不能集合，所以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是國民革命的最要方法。俄國大革命的當初，托爾茲基一派，專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運動，列寧則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農民運動，則農民必與工人階級分離，使革命的勢力，爲之薄弱，所以他注意農民運動，引他們參加革命，遂做成俄國大革命絕對大多數的勢力，使革命的基礎堅固不可動搖，這樣的革命辦法，是我們所當以爲法的。以上理論，可歸著爲三點：（一）革命本是爲民衆的；（二）喚起民衆爲民衆自己利益而革命；（三）革命得到民衆的利益。

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兩種：（一）是和我們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近如安南高麗，遠如印度，他們求自由平等的需要迫切，和我們相同，他們的敵人，也和我們相同。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

工作，我們和他們的聯合，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二）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而現在已能以國民的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的。例如蘇俄，他已使本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更進一步，要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如列寧所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革命的目的，是爲求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故此革命的義務，是要爲人類大多數的利益而奮鬥。於這一個目的之下，聯合起來，同盡義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是十五萬萬，中國人數四萬萬，在全世界人數中，占了四分之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是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主義。

總理的遺囑，如日中天，應該讓人人去體認，不應該由一個人去解釋。兄弟如今將自己一個人的體認，敘述出來，與諸君的體認，互相印證，可以曉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如此緊要，如此偉大，總理所付托於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我們得了總理的指示的一條光明的大路，使我們生出無窮的興會。我們想着我們所負的責任，使我們生出無窮的勇氣。

諸君啊，諸君於今開始負着這責任了，向着那一條光明的大路開始前進了，世界終是光明的，中國的國民革命，終是成功的，只看我們的努力，

一個人的理想，是無窮的，而生命是有限的。兄弟前天在廖黨代表追悼大會曾經稱述陳英士先生以至廖仲愷先生爲黨犧牲的事實，以陳英士先生之精明強幹，只看到帝國制洪憲摧

敗，便一瞑不視。以廖仲愷先生之至誠無息，只做到揚劉掃滅，便一瞑不視。兩位先生的思想，至少也周於全世界，而其生命只限於一部分事業的成就。我們此後的生命，最多不過幾十年，少者幾年，最少者幾月，皆未可定。只要在世的時候，爲國民革命，盡心盡力，做過一些工作，那麼，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不枉爲人一世也。諸君啊，在諸君今日畢業的時候，兄弟敢以致誠爲諸君祝：

繼續總理遺志！

繼續廖黨代表工作！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自由平等萬歲！

世界上一切民族自由平等萬歲！

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八月三十一日在黃埔中國國民黨立

陸軍軍官學校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日爲黨代表廖仲愷先生開追悼會，校長囑附兄弟說幾句話，兄弟原想將廖先生的歷史敘述一回，但爲時間起見，祇將最重要的幾點，簡單的敘述一下。

先生一生爲黨盡力，他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他所以能爲一般同志的領導，由於他平日人格的修養。我們要認識廖先生的人格，我們可以看見他最顯著的兩點。一是勤勞：他平日工作，至少十二三小時，至多十六七小時，是人人都知道的。他還有一樣，他無論如何忙法，到臨睡的時候，必要看書，這已成了他自然的習慣，所以他不但對於職務上精神堅強，便是他的學問智識，他能隨時代以增進，這一點是我們不可忽略的。二是廉潔；民國以來，他屢次做財政當局，而他的操守廉潔，始終如一，身死之日，家無餘財。人人知道廖先生在東山百子路有屋一間，但深知底細的人，便可說出這一間屋是他夫人由他母家所得私蓄積聚下來的。大約廖先生，前前後後，至多幫過幾百元或千餘元，他有這廉潔的操守，所以能保持他勇往的革命精神，歷久不拔，這一點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廖先生因爲有勤勞和廉潔的兩種美德，所以能爲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是廖先生平日人格的修養，至於廖先生對於職務的美德，更有兩樣，使我們容易認識，並且永遠不會忘記。一樣是對於總理和黨的決議，忠實服從。廖先生爲黨盡力，已有二十多年，他平日在總理左右時間最多，我們看見總理發一議定一策，廖先生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時總理採用廖先生的意思，有時總理堅執自己的意思，或採用別人的意思，廖先生對於決議，是一樣忠實的服從，忠實奉行，絕沒有因自己的意思，不蒙採用，而生出隔閡。不但對於總理如此，對於黨的決議亦如此，這樣紀律的精神，真是團體行動的唯一軌範。一樣是對於個人的出處進退，純然以公事爲主眼，不參一毫私見。舉例來說，去年

春間，廖先生任廣東省長，及中國國民黨改組，廖先生擔負工作最多，覺得不能兼顧，他便辭了廣東省長，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工人部長，及軍校黨代表等職。夏間總理因省長難得其人，命廖先生復任，廖先生覺得此時非兼顧不可，便也不辭。及至秋間，商團作難，廖先生覺得不能行其抱負，便又決然去任，連財政部長財政廳長等職，一概不就，專心於中央黨務及軍校。最近政府改組，一般同志，要他擔負財政當局責任，他覺得無可推諉，便擔負起來。由此可見他出處進退，完全根據着總理和黨的決議，及自己一身如何纔有利於黨，便如何做去，他看得自己一身如黨內的一副機器，他的出處進退，於他自己個人是沒有一毫成見的，這真足爲黨服務的模範。許多的人，對於自己的出處進退，縱然看破了權位勢利之爭，然而往往忘不了意氣之爭，這一點息氣之爭，往往誤了許多大事，對於廖先生這般態度，真當愧死。廖先生對於職務，因爲有這兩樣美德，所以能公爾忘私，不知有己，祇知有黨，所以能爲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雖然極其簡略，但是廖先生公正純潔的精神，已經可使我們認識。廖先生因爲有這樣公正純潔的精神，所以能有這樣勇往無前的氣魄，來擔負這樣重大艱苦的責任。他這回的死，完全是爲肯負責任與能負責任而死。死廖先生的，不是欲置廖先生的個人于死，是欲置廖先生所盡力的黨於死，是欲置廖先生所領導的一般同志於死，所以死廖先生的，不是廖先生個人的敵人，是黨的敵人，是一般同志的敵人。

敵人爲甚什麼置廖先生於死呢？總括說來，是要妨害中國國民黨的進行，切實說來，是

要妨害改組以後中國國民黨的進行。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敵人所以要殺廖先生，是因為廖先生在于中國國民黨改組期間，擔負責任最多，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廖先生是為改組中國國民黨而死，廖先生是將自己的生命，換取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

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呢？兄弟在本校擔任講授黨史，兄弟所講授給諸君的一個最重要觀念，便是時代觀念，用種種理論與事實，證明革命與時代之關係，證明革命是因於時勢之需要而發生。如今要講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也要先將那時代的形勢敘述一回。

民國十二年間，中國的時勢，是曹錕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示和暗助。推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而自己來做英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種傀儡的最大任務，是掃除國內一切革命派。所以他看得廣東革命政府如同眼中釘，用大批借款，大批賣國得來的軍械，指使手下一般用慣的嘍囉，從北江方面，攻打廣東。同時指使手下一般新附的嘍囉，從東江，西江，南路，一齊攻打，要把革命政府，困在中心。外面的形勢，已是如此，革命政府的內部又怎樣呢？楊希閔和劉震寰口口聲聲說是追隨總理，實行革命，其實是借着這名義來做盜賊的勾當。水滸傳中的晁蓋說時遷借梁山泊的名目，去偷鷄食，楊希閔劉震寰等，便是襲此故智。他們這種行為，比之陳炯明公然對於革命，實行叛逆者，還要可惡！因為公然的叛逆，是與革命分離，他的罪惡，與革命無涉。至於假借革命的名義，來做盜賊，將革命掩護他的罪惡，幾乎使革命二字為所污辱。他們擁護着總理，而所作所為，全然與總理相反，他們做種種殃民的事實，使人民受種種的痛苦，同時使總理受種種的痛苦。總理兩次三番，對

諸君所說的話，諸君總該記得，總理的不治之症，是他們所激成，總理是活活被他們氣死，如今想起，還要怒髮衝冠。諸君想想，在那時候，一切的革命行動，都看不見了，除了總理歷史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巍然存在，其他一切，都已黯然無色。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已到了存亡繼續的關頭。在那時候，要中國國民黨起死回生的方法，只有兩樣，一是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實施這兩種方法，實非容易。第一要將革命的意義，明顯指出。第二要將革命的敵人，明顯指出。因為這樣，誰是真正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假革命？方纔分別得清楚。這便是中國國民黨所以要改組的真正意義。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總理在那時候，已有決心。在那時候，用十二分的努力，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即現時所謂黨軍，為總理的臂助的是蔣校長。用十二分的努力，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將改組全黨的計畫，完全達到，以為總理的臂助，同時對於黨軍，為蔣校長的臂助的，是廖先生。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情形是怎什麼呢？只看未改組以前，全黨奄奄不振，改組以後，至於今日，不過年餘，革命的意義，在一般民衆中，已有普遍的宣傳，及明瞭的認識。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傀儡——大小軍閥——已成爲千夫所指，無所掩蔽，無所逃避的了。一般民衆，尤其是農工民衆，都齊心一意的傾向本黨，加入國民革命的工作。本黨的進步，已爲世界所注目，不只在中國以內，無與抗衡，同時武裝的黨員，爲掃除革命的一切障礙，先將盤踞東江的餘孽，完全擊破，繼將負隅省城的強寇，完全撲滅。這些都是數

年以來窮凶極惡莫敢誰何的，自改組以後，纔能將他肅清。如此說來，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的的確確是有進步，沒退步，無論何人，不能否認。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既然是有進步，那末，在改組期間工作最多擔負責任最重的廖先生，當然爲一般同志所推重，能領導一般同志猛向前進。只是同志越發推重，則敵人越發仇視。上頭說過，改組的動機，是要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要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由此可知真正革命的黨員和軍隊，既愛廖先生如手足，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必然恨廖先生如仇讐。於是他們自然而然的奔集於國民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之下，自獻其身，作爲傀儡，以與國民革命爲敵，以與領導國民革命的廖先生爲敵。廖先生之死，間接死於帝國主義之手，直接死於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

這一班反革命假革命的醜類，受了帝國主義的唆使，謀死廖先生，他不說廖先生的存在，和他反革命假革命的生活，有所不利；他不說廖先生以嚴格訓練黨員和軍隊的結果，一般反革命的，日益窮蹙，一般假革命的，亦被揭去面具，現出原形，無處躲閃，因而恨廖先生入骨。他卻異想天開的，憑空做出反共產的口號。這種口號，正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上海香港一帶所極力宣傳的。他既然自獻其身，作爲帝國主義的傀儡，當然有做應聲蟲的義務了。這還不足爲意，最無聊的，是一般無所用心的社會，他平日也不知什麼是反共產，什麼是共產，也不知道這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改組，更不知道改組以後真正革命的反革命的假革命的

當然要化分起來。不但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要排擠真正革命的，以維持他們虱處揮中的地位。但是真正革命的，也要清除反革命的假革命的，使此後的進行，能一致而活潑。這種化分，是改組以後必然的現象。他因為莫名其妙，所以看見改組以後的化分，認為一種不幸的分裂。聽見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便恍然的道，『哦，是因為共產反共產，鬧出來的』。這種聲浪，是助成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假革命的聲勢，中了他們的反間計，迷惑一般羣衆加入國民革命的趨向，遲緩了國民革命的進程。這還不甚緊要，最痛心的，是黨內一般青年，意向是純潔的，氣魄是勇敢的，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擔當，却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將國民革命一個意念，橫分爲二，這真叫做沒來由了。更可痛心的，是黨內辛苦培植的軍隊，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擔當，國民革命前途之一切障礙，正要他們去掃除，軍隊的意念是要單純而堅摯的，國民革命是軍隊唯一的意念，真所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却也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生生的要他分裂起來。這是何等的庸人自擾呢！黨外的人，中了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反間計，還有可說，甚至黨內的純潔勇敢的同志也陷於反間計而不自知！所以廖先生在世之時和兄弟等幾個人說起來，總是搖頭太息說，『腐敗的已腐敗了，幼稚的如此幼稚，如何是好』！廖先生被刺之際，當場捉獲兇手陳順，問他的供詞，他說：『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又說：『打死廖先生之後，又可分得萬多銀子』。噫！這個因為謀財而害命的兇手，他曉得什麼叫做共產？他懂得共產二字如何寫法？他懂得共產二字如何解釋？他公然說出『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的話，來掩飾他『打死廖先生之後可以分得萬多銀子』的

罪惡。兄弟所以敢確實明白的對諸君說道：廖先生之死，是死於帝國主義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他們是將反產的口號，來掩飾他們無窮的罪惡，同時還誘致別人陷入於無窮的罪惡！

當八月二十一日廖先生的遺體將入棺材裏的時候，他的夫人何香凝同志撫尸哭道：『我知道你沒有什麼掛心，最掛心的，是中國國民黨！』這一句話，死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一定在這裏含淚點頭。我們一班後死的人，眼看着廖先生慘死的遺骸，耳聽着廖夫人悲痛的絮語，友朋看見廖先生生前辛苦工作之後，搖頭太息的神氣。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想想，你們有使廖先生掛心的沒有呢？

俄國同志鮑羅庭先生，有一日有一篇極沉痛摯真的演說。他先說七八年間俄國同志，處於四面包圍，竭力奮鬥的時候，曾得過孫先生精神上道德上的援助，使俄國同志看得東方的光明，引起了同志間互相援助的感情，所以纔有十一年間俄國代表越飛與孫先生在上海會見的事，所以纔有十二年間他自己到廣東與孫先生會見的事。孫先生與俄國同志的結合，千言萬語，千條萬理，然簡括說來，不外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因為中國今日，除了這樣，沒有第二條生路。至於俄國同志，何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如此關切呢？因為中國國民革命，所對抗的是帝國主義，俄國革命所要撲滅的，也是帝國主義，目的相同，當然互相援助。我們同志，在今日裏，只要專心致志，做國民革命的工作，不必分心其他問題。因為我們同志，最多祇有數十年的生命，在這幾十年裡，完成國民革命工作，推倒帝國主義，我們同志，

早已安妥穩穩的，睡在地下了，甚麼共產呢，不共產呢，自有我們的子孫，去解決他，用不着我們此時爲他操心。鮑先生這一篇演說，何等沉痛，何等真摯。這是明瞭革命的時代觀念，明瞭革命黨人在那時代，應該做什麼工作，纔能如此明白坦率的爲我們指點出來。

我們想想，我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從呢？如其是的，如其是要三民主義實現的，則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實爲目前唯一的工作。『國民革命』四個字，在孫先生的遺囑裏，劈頭第一句，便說出來，跟着解釋道，『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不止給我們以標語，并給我們以標語的定義了。就民族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民族，將不能自主，以漸歸於淘汰。就民權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淪於次殖民地之地位，還有什麼民權可言。就民生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國家財政，國民經濟，皆受帝國主義之操縱，一切民生政策，從何說起？所以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必先要實行國民革命，推倒帝國主義。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工作，尤其是我們目前唯一的意念。一個革命黨人，關於革命的理想，是無窮盡，無止境的，而關於理想之實現，則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落後固不可，躑躅等亦不可。所以我們今日，除了國民革命之外，不必有第二個意念，亦不容有第二個意念，那些利用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來紛擾我們的意念的，正是帝國主義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陰謀毒計。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如果想對於廖先生的掛心，與以安慰，在今日的追悼會裏，在廖先生遺像的面前，揭破了這些陰謀和毒計，我們祇有一個意念，只有一個國民革命的意念，向着國民革命的一條大路，猛力前進！

各位同志，一黨裡頭，領導的人物，是由歷史做成的，少一個是一個。民國五年，死了一個陳英士先生，九年死了一個朱執信先生，十一年死了一個鄧仲元先生，這些損失，在本黨裏，是無可補償的。在那時候，諸先生雖死，總理仍在，一般同志，仍不失中心的提挈。如今死了一個廖先生，却在總理逝世未久之後，此其關係，比較以上諸先生的死，尤為重大。我們不幸。當着這個時候，我們不但有無窮的傷心，我們尤其要有無窮的勇氣！

國民革命，已經開始進行，這進行是不會中輟的，無論有如何的障礙，如何的牽掣，祇能加以頓挫，決不能令其停止。帝國主義的末路，已在我們的眼前，一切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自從真正革命的團結起來以後，已無復存在之餘地。我們確信國民革命是必會成功的，至於我們個人能及身見其成功與否，簡直不成問題，我們只有堅固我們的信念，充實我們的勇氣，猛向前進。

各位同志，今日在此追悼廖先生，各位同志，將對於國民革命的一個堅決的意念和勇猛實行的志氣，迸發出來，各位同志的精神，與廖先生的精神，融合為一，廖先生肉體雖死，精神不死，兄弟敢大聲的道：「廖先生並沒有死！廖先生並沒有死！」

悼廖仲愷同志勗諸同志

（八月二十二日在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

當國民革命積極進行的時候，三月十二日喪失了唯一的領袖與導師孫先生！不及半年，

八月二十日又喪失了最奮鬥最努力的同志廖仲愷先生！我們一般同志恰如一家兄弟，當流離顛沛的時候，喪了慈父，又喪了最親切的長兄，這是何等的悲痛？

當這時候，我們還沒有敘述廖先生生平歷史的餘暇，我們最難過的是廖先生半途遺下的工作，交與何人承繼？他艱難百折，成立了黨軍，成立了種種農工團體，最近掃除叛亂之後，他和幾個同志，共同努力于軍事統一，他更單獨的努力于財政統一，這些工作，都已半途放下，這已是他臨死的時候所不能放心的，然而他最大的不放心，還是他夫人何香凝同志所說，『中國國民黨的前途』。

人人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所做成的，而不避勞怨，用十二分的努力來實行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廖先生實是第一人。他不但因此廢寢忘餐，每日做十七八點鐘的工作，他更因此受一般人的怨恨與詛咒。這種怨恨與詛咒，不是他個人的生死關頭，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關頭，我於悼廖仲愷同志的時候，對於此點，不能不鄭重的說幾句話。

中國今日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故此我們同志現在決不會發生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祇有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問題。就現象來說，中國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條生路。就孫先生的遺囑來說，既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項工作。我們既然要反帝國主義，則帝國主義定然以共產兩字相加，這是三兩年來公然的事實，無可疑的。帝國主義既如此，則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當然隨聲附和，因為反帝

國主義是目前所必需的，是要合一般民衆共同努力的，沒有可以非難的餘地。所以只有將共產二字，恐嚇一般資產階級民衆，使之自相携貳，同時和用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在黨內挑撥離間，使之自相分裂；這真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最得意的陰謀毒計。這種陰謀毒計，影響於廖先生個人的生死，更影響於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

我在今日，更無他說，我們同志要反帝國主義的，便向左去；要生存於不平等條約之下，使中國永爲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國主義之永久勢力於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甚麼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因爲，如果要作帝國主義的走狗，不是將反共產三字便可作爲護符，如果要反抗帝國主義，祇問他是否實行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更不必問他是否共產。最可笑的，有少數同志，一面勸人反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排斥左派分子，須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因爲增加左派分子，所以反帝國主義的工作。纔能活潑有力，這最顯著的事實，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當商團作亂時代，當東江討伐時代，當廣州附近掃除叛亂時代，當沙基慘案發生時代，左派分子，如何努力，如何奮鬪，我們不應盲目，不應喪心，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左派分子？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廖先生主張容納左派分子？如果說我們要造就一般三民主義的信徒來實行國民革命，這是應該的，但我們決不應該藉共產二字爲口實，以排斥左派分子，這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生死關頭所在。

諸同志，中國國民黨繼續發達，以至今日，是孫先生心力所做成的，而廖先生實是孫先生最大臂助，八月二十日廖先生橫尸於中央黨部門首，使一般同志，明明白白得了一個廖先

生爲黨而死，爲主義而死的最明瞭的印象。廖先生畢命於一瞬息間，沒有半個字的遺言，但我們敢信孫先生的遺言即是廖先生的遺言，我們如果沒忘記中國今日尙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世界上尙有許多窮苦無告的民衆和壓迫的民族，我們祇有向國民革命做去！

革命的分子應有之決心

（九月九日黨軍在北較場開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辭）

廖黨代表死了！

廖黨代表爲什麼死的？誰置廖黨代表於死的？

這兩句話，中國人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更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軍的同志，尤其不能不問。

廖黨代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他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他這回的死，是爲國民革命而死，置他于死的，是他的敵人帝國主義。試看廖黨代表死後所有帝國主義報紙論調，及兇手的供詞，可以明白。

只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不是外國人，偏偏是中國人，我們拿着兇手陳順，他的供詞說，『廖仲愷是共產，所以打死他』，又說『香港叫我打死他，打死他之後，我可以分得萬多銀子』。哼，隨便製造一個口號，拿大批的金錢，便可以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好利害的帝國主義的手段！

各位同志，帝國主義不但是殺廖黨代表用這一種手段，便是殺盡中國人，殺盡中國，也是用這一種手段。民國二年間，五國銀行團借二萬萬五千萬給袁世凱，便將革命黨殺的殺，趕的趕，不能容。在中國以內。民國六年間日本借三萬萬給段祺瑞，便將西南各處，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民國九年以後，英美借幾萬萬給曹錕吳佩孚，便告奮勇，要殺盡中國革命派，川湘各處，次第受其塗毒，而廣東革命政府，更爲其唯一仇殺之目標。以上種種，都是十四年來的事實。各位同志，有從各省來的，有在廣東生長的，不只眼見，而且身受，不用多說。帝國主義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這種手段，已成了習慣。從前的許多中國人，是這樣死法，許多救中國的中國人，是這樣死法，如今廖黨代表，便是這樣死法，將來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救中國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等到救中國的中國人殺盡了，中國也就盡了。

帝國主義不用說，他本是國民革命的敵人，最無聊的，是一般中國人，却甘心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替國民革命的敵人，來出死力，陳順不過是走狗中之走狗，這一般走狗，中國隨處都有，我們如果要拿兇手，這一般走狗沒有一個不是兇手。

中國人殺中國人，中國人殺救中國人的中國人，已經是在情理之外了，然而這一回的案情，還不止此，是以中國國民黨人殺中國國民黨人。兇手是陳順，陳順是朱卓文所指使的，林樹巍胡毅生趙士觀等是與朱卓文同謀的，他們不都是中國國民黨人麼？實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中國國民黨人的責任，而他們却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

，來破壞國民革命，至於謀殺黨裏頭最重要的同志，豈不更是在情理之外？這種原因，無論黨內黨外的人，都不明白，甚至於咨嗟太息，以爲『同志間互相殘殺』，我們對於此點，以爲有將原因解釋明白之必要。

凡是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其中必含着許多複雜不純的分子，這是自然的事。中國國民黨，在未改組以前，其中分子，可分爲各派，有革命派，有反革命派，有假革命派，改組以後，仍然如此。只是在未改組以前，因鬆弛散漫的結果，各派繁然雜處，真所謂各不相謀，結合的力不大，排擠的力量也就不大。改組以後，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驟然緊張嚴整起來，團體既由散而整，在其中分子，自然有由雜而純的趨勢，於是革命的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也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不是革命的團結起來，肅清反革命假革命各派，便是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聯合起來，排斥革命派。這種化分，不但是改組以後所不能免的事，並且正是改組之本來目的，如果一個黨，讓種種分子，雜糅在內，那就只有分子的行動，沒有黨的行動，又何貴乎有黨。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正是要將革命的分分子，團結起來，將所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分子，驅逐出去。那麼，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分子，爲保持他們的勢力，自然與革命的分分子爲敵。我們無論是當局的或是旁觀的，對此現象，總應該分別個是非，不應該咨嗟太息，說一句『同志間互相殘殺』，便作爲了事。

以上所說，不只是黨裏如此，黨所屬的軍隊，也是如此。中國國民黨未改組以前，屬於黨的軍隊，也有種種派別：有公然背叛的，如陳炯明等是，這便是所謂反革命；有假借黨的

名義來做盜賊的，如楊希閔劉震寰等是，這便是所謂假革命。至於不革命的呢，一時也說不了許多，總之不肯犧牲個人私利的，皆屬於此派。在革命旗幟之下，有這種種派別的軍隊，於革命不但無利，而且有害。民國十二年間，廣東一切痛苦不堪的現狀，都原因於此，所以創立黨軍，與黨的改組，在那時候，同有一樣的必要。

黨的改組的結果，如馮自由等，便驅逐去了；創立黨軍的結果，陳炯明等，最先掃除，楊希閔劉震寰等，跟着消滅；這便是革命的黨員革命的軍隊團結起來所發生的効力。在這時候，反革命的，與革命的，勢不兩立，固不由說；而假革命的，恐怕揭去面具，現出原形，失了向來的憑藉，其敵視革命的，較反革命的為尤甚。至於不革命的，因為要保持他在黨中的安逸和利便，自然和革命的做一處，以做他們排斥革命派的勾當。廖黨代表之死，便是死於這一般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黨員與軍隊之手。

各位同志，你們是不是革命的黨員？是不是革命的武裝的黨員？是不是和廖黨代表站在一條戰線上？如其是的，廖黨代表已經做了一個先登陷陣的犧牲者了，我們的戰線，已被敵人搖動了，我們如果不堅持著，不拚力向前，我們的戰綫，一定為敵人所沉沒，那麼，不但沒有了我們，而且沒有了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按住了傷心，提起了勇氣，將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肅清了去！他們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是殺中國國民黨的兇手，是殺中國的兇手，我們要用嚴厲的手段，將他們掃蕩乾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我們對於敵人仁慈，便是對於同志殘忍。各位同志猛省！各位革命的同志猛省！

革命的份子，團結起來，不只要存在，而且要擴充，對於一切敵人，應該無容忍無姑息的，使之消滅，正如古人所謂君子道張，小人道消，欲救中國國民黨，只有此法，欲救中國，只有此法。

我們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外，還應該有一口號，清黨內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予！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我們屢屢和國民說道，民國以來所有的變亂，沒有一次不是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成。以往事來說，二三年間五國銀行團之於袁世凱，六七年間，日本之於段祺瑞，八九年以來，英美之於曹琨吳佩孚，真是極顯著的事實。以近事來說，在孫先生北上以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國內外，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唆使陳炯明煽亂東江，繼而唆使楊希閔劉震寰跳梁省城；國民政府對於青島九江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堅持反對，及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引誘廣州一般無聊政客失意軍人，做那狙擊政府重要人物及危害政府的舉動，繼而引誘東江一班殘餘敵人，做那賣國營私殃民自肥的復興運動。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真真是越做越露骨，越使國民看得清楚。

只是逃不了一個公例，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只有趁國民未覺悟的時候，可以爲所欲爲，一經國民覺悟之後，他那些勾當，便只有歸於失敗了。試看看啊，今年二三月間，陳炯明等在東江的破敗，六月間楊希閔劉震寰等在廣州的破敗，以及八九月間，廣州內外反革命派的次第破敗香港帝國主義者眼巴巴望着他的內應，已被革命派摧陷廓清了，由此可見國民覺悟之後，決不容國民裡頭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存在。

香港帝國主義者，利用反革命派，危害廣州革命根據地的計畫，已經失敗；知到廣州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沒有入寇的餘地；於是變更計畫，對於東江一般殘餘敵人，用些金錢軍械，作爲釣餌，使他擾亂東江，這一般殘餘敵人，不用說，自然便上釣了。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計畫，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使這一般殘餘敵人，能夠恢復勢力，和廣州革命政府對抗，永永做他們的家狗，實行桀犬吠堯的勾當。第二個目的，是利用這般走狗的勢力，將汕頭罷工團體，盡行解散，罷工勢力，盡行破壞，拔去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這兩個目的，現在已經着着進行了。

有覺悟的國民，對於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的計畫，應該怎麼樣呢？

就第一來說，今天二三月間，我們已把東江餘孽掃平了，何以還要回師廣州？是因爲楊希閔劉震寰盤據廣州的緣故。六月間我們已把楊希閔劉震寰的惡勢力掃平了，何以七八九三個月，頓兵廣州，不能將東江餘孽，重新剷定？是因爲反革命派的勢力在廣州依然存在的緣故。自從八月二十日廖先生被刺以後，方纔用不妥協不姑息的手段，將廣州及西江五邑反革

命派的勢力，次第掃除，再將東莞增城寶安一帶，反革命派的勢力，也次第掃除，革命根據地，已經打掃乾淨，從此集合革命派的勢力，猛向前進，沒有後顧之憂了，即使東江一般殘餘敵人，不來惹我們，我們也要去剿滅他，以爲人民除害，何況他自來送死。香港帝國主義者供給他們金錢軍械，只算是給他那一般走狗送終便了。革命派的同志，集合起來，掃平東江餘孽在此一舉！

就第二來說，帝國主義者，利用走狗，欺壓人民是他得意的手段，只看他在天津上海，用這種手段，解散罷工團體，破壞罷工勢力，使一般人民，受更深的欺壓，便可見他手段利害了。他自然想依樣葫蘆。的將這種手段，在汕頭施展，他不知道革命政府和罷工團體一致的，革命政府的勝利，就是罷工團體的勝利，罷工團體的勝利，也就是革命政府的勝利，革命政府既然不容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汕頭苟延殘喘，那麼帝國主義者又何所附麗以爲惡呢。

總而言之，有覺悟的國民，是不會失敗的，因爲國民覺悟帝國主義之爲害於中國，同時也覺悟國民革命之必要，所以日前政府黨部軍隊，省港罷工團體，以及士人農人工人商人，聯合起來，要求和平，要求廣東統一，這便是國民覺悟的一個絕大徵象。

到了今日有覺悟的國民，這種要求，快要實現了，國民爲實行這種要求所必要做的，是以下兩件事。

(一) 統一廣東，要分幾個步驟。第一步驟，是鞏固廣州，因爲廣州是廣東全省中心點

，必須將廣州統一，纔能將革命派的勢力，集中在一處。第二步驟是肅清東江南路，革命派的勢力，既然集中在一處，便自然能夠發展出來。在這時候，廣州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廣東全省人民了。別的不用說，只說軍事的負擔，有東江南路的人民共同擔負，廣州人民，自然便減輕了許多；東江南路人民，平時本有對於反革命派的軍事負擔，這些負擔是無價值的犧牲，如今換了對於革命派的軍事負擔，是有價值的，何況這種負擔，是與廣州等處人民共同，比從別也減輕了許多了。這還是就消極方面來說，至於積極方面，廣東全省人民的幸福，也就於此得一基礎了。第三步驟是出兵北伐。民國十三年五六月間我們曾一次出兵北伐，已經進了江西，節節勝利，却因為廣東的根據地，沒有鞏固，以致發生變故，不得已的回了轉來，功敗垂成，所以出兵北伐，是以廣東鞏固為前提的。如果廣東統一，現在兵額，至少有五分之四，可以出去北伐，留五分之一，鎮守廣東，後顧無憂，前進便可放心了。在這時候，廣東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全國人民了。關於第二步驟的理論，於此也可完全適用了。總而言之，東在這時候，可以說破壞告終，建設開始。以上三個步驟，是要依着次序一一做去不可躐等，也不可半途而廢的。

(二) 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也要分幾個步驟。本來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是打倒帝國主義各種工作裏頭的一件工作，帝國主義，到了今日雖說末路，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殫，要完全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持久，戰三四年也不定，五六年也不定，在這持久戰中，作戰計畫，為出奇制勝起見，應當變化無窮。就六月底至九月底來說，因為省港罷

工的緣故，給香港帝國主義者經濟上一大打擊，使他經濟侵略的進行，受一大頓挫，同時因爲切斷香港廣州間交通的緣故，使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失了奔走穿插的作用，使廣州肅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不受牽掣，這幾個月的作戰計畫，我們敢斷言已經得了勝利。從九月底起，我們便已變更了作戰計畫了，我們派外交代表團北上，使他們於經過上海九江漢口的時候，都發起外交代表團，將五月三十日以來各處慘殺案發生地人民的要求，攏合在一起，更在北京發起各省外交代表團，將全國人民對於外交的主張，攏合在一起，使國民革命運動的勢力範圍日趨擴大，同時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託於這個外交代表團，做成一個統一的運動，打破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各個擊破的陰謀，這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既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托於外交代表團，同時由省港罷工團體，將復工條件，自動的提了出來，帝國主義者若是答應呢，省港工人團體，便得了確實的進步，若是不答應，帝國主義者之忍心害理，益發暴露無餘。在彼爲情見勢拙，在我爲進退裕如，這也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

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抱住了一定的目的，同時應用各種適宜的作戰計畫，那最後的勝利，便有把握了。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件事的步驟和方法，便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助革命軍掃平東江餘孽，因爲這是統一廣東的關鍵，也是統一中國的初步。同時還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省港罷工團體務要完全達到所提出的復工條件，因爲這不僅是省港罷工工人的勝利，是全國人民

的勝利，是國民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

廣東人民聽者！帝國主義的勢力多減削一分，國民革命的勢方便多增進一分。有覺悟的國民一齊起來，鞏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擴大國民革命的運動！

十月二日在陸軍軍官學校就職黨代表演說辭

校長，各位同志，兄弟今日就黨代表職，有幾句話，想對各位同志說。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托兄弟以黨代表的重責，兄弟初時本不敢擔任，因為本校是蔣校長廖黨代表秉承總理的訓令，苦心孤詣，慘澹經營，以有今日，如今廖黨代表中道死去，兄弟自願才力遠不如廖黨代表，恐怕不能如廖黨代表一樣擔負重責。而且自從七月以來，國民政府成立，兄弟以中央執行委員資格，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日夕無暇，實在不能專心致意，擔任黨代表的職務，從前廖黨代表已深以兼職為苦，何況兄弟更不能不有所顧慮了。記得從前讀過了一首詩，題目是『哲學家的驢子』，敘說一頭驢子，馱着一輛車子，車子上滿載着什物，那驢子一步一步的，只顧前走，沿途給人在車子上增加什物，他也毫不顧慮，做出一種哲學家的態度，似乎無所不可的。及到後來，載也重了，力也竭了，驢子也倒了，車子也翻了，車子上的什物，都拋落在地上了。這一首詩，對於一般不度德不量力的人，真是晨鐘暮鼓，兄弟所以不能不有所顧慮。

只是仔細一想，四萬萬人裏頭，纔有百餘萬的黨人，這百餘萬黨人，要替四萬萬人擔當

責任，那一個不應該像驢子一樣？所以不度德，不量力，擔當過分的責任，不盡是驢子的罪過，只有一面儘管擔當着，一面希望有別的驢子，來分些擔當，庶幾不至於翻了車子，革命黨人，一面強迫自己，一面喚起同志，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兄弟想了幾回，終於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托了。

兄弟本是本校的講師，和各位同志見面的時候很多，有許多話，隨時可說，如今所要說的，是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同志間，應該互相討論，互相解析。兄弟今日以此為演說的題目，比較泛泛的說幾句就職的套話，似乎好些。

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很多，如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主軍與客軍的問題，親俄的問題，在平時本已甚囂塵上，自從八月二十日廖黨代表死了以後，這些問題，尤其成了焦點。即如兄弟和蔣校長，在特別委員會裏，對於時局的處置，也不免惹起社會間的疑問。關於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兄弟八月三十一日在本校廖黨代表追悼會裏，九月六日在本校第二期學生畢業會裏，已經說過，如今不再說了，如今所要說的，是以下的兩個問題。

主軍和客軍，這一類名詞，在廣東是相傳已久，自從八月二十五日，解散了駐省和駐在江門等處的反革命軍隊，九月二十日又解散了駐在東莞增城寶安的反革命軍隊，那些被解散的反革命軍隊，恰恰都是粵軍，而執行解散的任務的，恰恰都是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於是一般造謠的人，紛紛的說道：『這是客軍排斥主軍了』，而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裏，居然也有些自己思疑自己道，『我們客軍不應該犯此嫌疑』。兄弟如今要問的，什麼叫做

客軍？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在中華民國的領土裏，我們明明是主人，如何說是客？我們既不是客，又從那裏跑出主人來？所以客軍和主軍的名詞，實在不通。廣東所以有客軍的名詞，是因為民國二年以來，廣東受了龍濟光所統率的滇軍的蹂躪，跟着又受了陸榮廷所統率的桂軍的蹂躪，使廣東人民，容易養成一種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而民國六年以後，革命黨人裏頭，如陳炯明等，不知道本着革命的精神，來打倒反革命的勢力，都想利用一般人民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使自己的企圖，容易成功，所以九年自漳州回師的時候，便高揚着排斥客軍的口號。果然莫榮新等便在這口號之下被他打倒了，陳炯明等既以排斥客軍自命，當然便以主軍自命。他們以為莫榮新等在廣東並沒有別的罪惡，其罪惡只在一客字，我們既然是主，便一切罪惡，都無所謂罪惡了，所以驅除莫榮新等之後，自己便不知不覺的成功了驕兵悍將。十年進兵廣西，更充分發揮他們驕兵悍將的罪惡，於是十一年六月以後，所謂主軍，為粵於廣東，更什百倍於所謂客軍了。他們的思想，真是奇怪，外省軍隊蹂躪廣東，固然是罪惡，難道廣東軍隊蹂躪廣東不便是罪惡？他們自知在道理上也說不過去，無如事實上，他們已成了驕兵悍將，回不轉頭，除了蹂躪廣東，再沒有可以施逞他們的獸慾。恰恰在那時候，大軍閥把持中央，藉着統一名目，來擴充地盤，小軍閥割據地方，藉着聯省自治的名目，來保守地盤，他們聽了聯省自治四個字，自然聲入心通的，比着漢高帝要叔孫通制朝儀還要高興了。所以陳炯明等的事業，以排斥客軍始，以聯省自治終，這都是由於他們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他們如不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便只有革命軍隊打倒反革命軍隊，管他什麼主軍客

軍呢。陳燭明等既如此，魏邦平等更不用說。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革命，他們的思想。只知道在家鄉發財，做大官，做大地主，此外更無思想。他們以為本省的官祇許本省人做，不許別省人做，本省的地皮祇許本省人劃，不許別省人劃。所以九年驅逐莫榮新之役，他們只知道排斥客軍；十年援桂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陳燭明是何等罪惡，他們都說道：『孫陳都是廣東人，我們守中立罷！十二年春間，楊希閔劉震寰假藉驅逐陳燭明的名義，進兵廣東，他們於驅逐陳燭明的時候，袖手旁觀，而於陳燭明被驅逐之後，都掛起排斥客軍的招牌，以致被楊希閔劉震寰打倒。十四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他們仍然說道：『陳燭明是廣東人，我們不必幫手去打』，及至六月間，廣州近郊之戰，他們說道，『這是排斥客軍啊，我們要加入』。他們每於外省軍隊駐在廣東擁有勢力之時，便蹙着眉頭說道，『亡省』。哼，他們不怕亡國不怕滅種，却怕亡省！他們的是非善惡都以省與非省爲斷，所以救國兩個字，是打不動他們的良心，喚不起他們的勇氣的。深刻的說起來，他們所謂省是供給他們做大官做大地主之省，正所謂省其所省，非吾所謂省，所以他們其始不過是不革命，其終必至於反革命，與陳燭明等的假革命，罪惡維均，所不同的，陳燭明等還扭扭捏捏的道，『聯省自治』，他們却老老實實的道，『服從中央』便了。以上陳燭明魏邦平兩種人，都是在廣東倡主軍客軍的原動者，他們的來源去脈，不過如此，所謂主軍客軍的問題，何值得我們一顧呢？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只知道有所謂革命反革命，不知道有所謂主軍客軍。我們只知道革命團結起來，將反革命的打倒下去，不知這什麼是主什麼是客。

二三月間，我們在東江所打倒的，是陳炯明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主軍，我們却只知道這是反革命的軍隊，所以我們要打倒他。六月間我們在廣州近郊所打倒的，是楊希閔劉震寰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客軍，我們却只知道這是反革命軍隊，所以要打倒他。然則我們八月二十五日在省城和江門等處所解散的，九月二十日在東莞增城寶安所解散，只知道他是反革命的軍隊便了，管他是客軍抑是主軍呢。兄弟記得十三年秋間，先總理在大本營裏，曾召集一次軍事會議，在座的多是湘桂軍官，先總理就座以後，默然無言的約十分鐘，方纔說道：『汝們於十二年春間，替我出力，趕走陳炯明，我是極感激汝們。當時我因為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所以並不想回來，你們却派人到上海，請我回來，說要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所以我便回廣東來了。誰知你們却是戴着我的帽子，來糟蹋我的家鄉，這不要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準備犧牲的，我可勸父老兄弟，都準備犧牲，果然有益於國，將家鄉做犧牲，有什麼要緊？誰知你們却不是爲國的，我覺得對家鄉不住，尤其對國不住，我決意離開你們。』這是何等血誠，何等慘痛，兄弟和先總理患難相從，二十餘年，聽見先總理痛心疾首的這一番話，一生一世，再不能忘的。兄弟也是一個廣東人，站在家鄉裏，兄弟覺得現在各省同志集於廣東，要將廣東作爲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是不革命的，便喝一口水也對廣東人不住，如果我們是革命的，我們所馱着的車子，廣東人也要分些，不能讓我們獨做驢子，我們現在對廣東是如此想，將來出師北伐，經過各省也是如此想，什麼主軍各軍的話，在我們革命軍裏，沒有這一回事。

至於所謂親俄的問題，在香港上海天津一班帝國主義的報紙中，肆意詆毀，自不必說，國內一班帝國主義的走狗，跟着狂吠，更不必睬他。最可怪的，一班袖手旁觀的不革命派，也在那裏信口開河的道，『他們何苦去親俄呢？』便連革命黨裏頭，也有些思疑不定的道，『我們何必耍親俄呢？』我們對於這些話頭，只能給他一句斷語道：『忘了國民革命的使命』。須知道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現在何以不得自由平等？因為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此束縛加於中國？是帝國主義。所以帝國主義，是國民革命之最大敵人，所謂軍閥，不過是一些帝國主義之走狗，決不能與帝國主義，相提并論。我們既認帝國主義為我們最大敵人，我們便不可不考究帝國主義之來源，及其現在之勢力。我們要將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的歷史，揭開一看，便知道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真是世界之敵人。無論將漸滅的紅種，已奴隸的黑種，正在被蹂躪中的棕種，以至印度緬甸安南朝鮮一切黃種，如果覺悟到自己所處黑暗慘淡的地位，是帝國主義所賜，斷沒有不咬牙切齒，認帝國主義為最大之敵人的。我們對於這些共同目標的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如今世界，固然是白種人橫行霸道的世界，但白種裏頭，以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其實只不過極少數人，如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等等；其最大多數的，都是窮苦無告的人民。他們在種族上，似乎和紅黑棕黃諸種人感覺不同，而在階級關係上他們所受的壓迫，正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無異。帝國主義一面對於殖民地肆行經濟侵略，一面即以其侵略所得，為鈐制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資料，所以世界被壓迫民族，和歐洲被壓迫階級，相互間已因共同利害，

誘起共同行動。他們共同承認帝國主義爲他們共同的敵人，建立了一個共同目標，一致努力打破了種族的界限，成立了世界革命的最大基礎。我們對於他們打破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工作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俄國在大革命以前也是白種人所建立的國家裏頭，一個極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大革命以後，自己拋棄了從來固有的帝國主義，却被各個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將他封鎖，要他生生的凍死餓死。他好容易從重重封鎖中，掙脫出來，自己得了自由，同時也想世界上一切人都得了自由，所以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便定下了民族解放的政策，對於歐洲被壓迫階級便定下了階級覺悟的政策，這真真是帝國主義的死對頭，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他的志願，由他的領袖列寧，明明白白的說了出來，世界上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向二萬五千萬的壓迫人民，要求解放。我們對於這樣以世界革命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進，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從前說瓜分，如今說共管，都是取一致的步驟的，動不動的便英法聯軍，便八國聯軍，動不動的便三國銀行團，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五國銀行團，他們帝國主義者間，互相聯合，惟恐不力，看見我們和別人聯合，便大嚷起來，好像我們犯了大不韙似的。哼，說一句粗魯話，這不合無恥的富人，自己娶了十幾個小老婆，恐怕那些小老婆去偷漢子是一樣的用意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勇氣，却偏要多疑，他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俄國何故幫助我們呢，只怕不懷好意罷。』他雖然不相信理論，他不能不相信事實。比如民國六七年間，日本說幫助段祺瑞參戰借款和供給軍械，卻一手的，將中國無數利權，攞了過去。我們根據這些事實，便可以說日

本的幫助。是不懷好意。如今俄國的幫助我們是怎樣呢，他起先和中國成立了中俄協定，將從前帝國時代，對於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特權，一概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他隨後認定了中國裏頭那些人是要做國民革命的，使用他的心力，去幫助那些人，他沒有一些別的要求，他沒有一些別的企圖，也沒有佔過一些便宜。他沒有拿過一些利益，他只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也就是他的敵人，他只求以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促進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雖然不相信理論，難道事實是憑空可以捏造的，是憑空可以抹殺的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強固的精神，却偏會有虛驕之氣！他又吶吶的道，『我們革命，要憑自力，不要求人幫助』。須知道在這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在一起，反帝國主義自然也在一起，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互相幫助，算不了什麼稀奇，便是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也是尋常的事。為什麼八國聯軍要舉瓦得西做統帥呢？其他七國，難道便算是放棄主權了麼？為什麼協商國要舉福煦做聯軍總司令呢？別的國家，且不用說，英國有兵四百萬，美國有兵也不下三百餘萬，何以要受福煦的節制調遣呢？好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啊，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求人幫助，並且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以求最後的成功，怪不得叔向說道，『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了。我們如今得俄國同志道義上的幫助，我們便要忸忸怩怩的，怕人問及。喂，同胞啊，你上了帝國主義者老當了！須知道在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線上，我們始終要和世界被壓迫民族在一起，和歐洲被壓迫階級在一起，和世界革命的先進在一起。我們這聯合戰線，是無人可以搖動的，是無人可以離間的，是無人可以衝破的，我們一致努力，一

致要求世界革命成功。

以上兩種疑問，已經次第說明，各位同志，總可相信兄弟所說的話，句句是出於血誠。兄弟的話，本可於此暫歇，只是兄弟還要說幾句話，我們同志最要緊的，是以誠相處，以誠相處之道，第一要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兄弟的說話行事，如有錯的，各位同志必須質直相告，兄弟如不認錯，便不是人，錯而不改，也不是人。兄弟的說話行事，如其不錯，各位同志，便應該和兄弟一致努力，不然，縱使紀律不來責備，自己的良心也要責備自己的。再者，我們同志間，要以感情相結，尤其要以理性相契，所以我們同志間，就感情來說，極其親熱，就理論來說，却極其嚴正。比如最近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特別委員會，拿捕了一些反革命的黨員，和解散了一些反革命的軍隊，有些人便說道：『他們從前都是有功於革命的。何忍出此？』哼，這便是只知有感情不知有理性的話了，這是封建時代的思想，不是革命時代的思想。●封建時代，對於建功立業的人，便要崇德報功，縱使有罪，猶將十世宥之。革命時代，對於有功的人，固然愛之敬之，只是他如有罪，便也不能放過。如果因為他有功，便連有罪也不問，那就無異說道『他從前做過許多革命的事，如今應該由他做許多反革命的事來做報酬罷』。那又何須乎有革命呢？革命是向前進的，不是向後退的，封建時代，所以一治一亂，互為循環，正由於這些觀念，弄不清楚。革命時代，豈容再有這種思想？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嚴酷，正是對於革命的人仁慈，反之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仁慈，便正是對於革命的人嚴酷。假使八月廿五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壓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必因慶黨

代表的死，繼長增高起來，將革命的勢力，推倒無餘，廣州便不能爲革命的根據地了，還想
出師東江南路，使廣東統一於革命勢力之下麼？又假使九月二十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推
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依然存正，縱使我們出師東江南路，回頭一看，廣州已成爲反革命的
根據地，至少要像今年二三月間用兵東江一樣，於收復東江之後，仍不能不將東江拋棄，回
師廣州了，這不是將同志的血肉，做無代價的犧牲麼？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對於反革命
派讓一步，便是使反革命勢力進一步；革命勢力退一步，我們引反革命派出了生路，便是引
革命派入了死路；我們有革命的意義極嚴肅的立在前頭，使我們不能不收斂感情歸於理性。
有些人說道，『八月二十五日的結果，使胡漢民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九月二十日的結果，
使許崇智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他兩個都不是反革命的人，何以如此待遇？』須知道他兩人
誠然不是反革命，而許多反革命的正在包圍他，擁戴他，又何能投鼠忌器呢？『桃應問曰：
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封建時代，尙且有此
思想，何況革命時代？民國十四年來所以亂個不已，不是由於敵人之跋扈，却是由於同志間
之姑息，姑息二字，真是萬惡的歸宿地，同時又是萬惡的發源地。許多好好的革命同志，就
姑息二字，生生的作成他做了反革命，說起來真是痛心不盡。兄弟今日沒有別的要求，所要
求的兄弟若有反革命的行爲，各個同志便立刻將兄弟打倒，原爲我們同志，今日所需要的，
是對於反革命派取不姑息的手段，必要如此，方纔能將國民革命的責任擔當起來。

兄弟的話，已說完了，當東征軍將出發的時候，各位同志，有往前方努力的，有在後方

服務的，兄弟敬祝各位同志健康！國民革命的勝利！國民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自由平等萬歲！

什麼是反革命

有人問我，道『近來「反革命」三字，與滿洲末造「保皇黨」三字，成爲一樣惡劣的名詞，究竟什麼是反革命？』

我答他道，『凡是不肯反對帝國主義的，和不肯提倡農工運動的，都是反革命』。我這話，理論的根據，全在總理遺囑。總理遺囑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句話，將革命之目的及其方法，說得周密無遺。

甚麼是民衆？固然是全民。然占民衆之大多數的，是不是農民，是不是工人？除却農民工人，便是除却大多數民衆，『全』字從何說起？由此可見，所謂『喚起民衆』有十之七八，是提倡農工運動的意義。

有人說道，『我並不是忘却提倡農工運動，我只是勸資本家對於工人要仁愛，勸地主對於農民要仁愛』。哼，恕我說一句刻薄話這，和封建時代盼望『真命天子』『天王聖明』的思想有什麼分別？何不把大學的『爲人君止於仁』，改作爲資本家止於仁，爲地主止於仁呢？

然則我所謂提倡農工運動，是不是只知道農工，忘却了其他民衆呢？我可以明白的答覆道，我並沒有忘却，只是我對於大多數可憐的農民工人，不提其他求人仁愛，待人仁愛，提倡他能使人不敢以不仁愛待他，換一句話說，便是他有權力來維持道德。

說到這裏，我可以下一句斷語道：凡是看見大多數可憐的農民工人受人壓迫的形景而不起來助他解除壓迫的，便是不仁愛，便是反革命。

有人說道，『農工運動，我本來是贊成的，只是現在的農工運動，太過幼稚，有許多不良分子，夾雜在裏頭，所以我不能贊成』。這些話，只算是廢話，農工運動裏頭，如何能說沒有不良分子，只要日加努力，組織工夫做得好，宣傳工夫做得好，那些不良分子自然漸漸淘汰，這有什麼值得搖頭歎氣的呢？而且人類一切運動中，有誰能說沒有不良分子夾雜在裏頭，何獨農工爲然？以此藉口，來反對農工運動，我沒有別的說話，只說他是反革命。

以上把民衆二字，解釋清楚；至於帝國主義四字，可以不用詳細解釋，簡括一句話，凡是不以平等待我的國家，便是帝國主義。所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一切帝國主義者，如政客軍人商家等等，不用說，至於傳教士教育家，向着我們，往往開口便說『博愛』，我們可以問他道，『既不平等，何云博愛？』向來祇是兄弟朋友間，有所謂博愛，因爲他是平等，至於主人之於奴隸，便祇有所謂恩惠，無所謂博愛了。

說到這裡，我又可以下一句斷語道：凡是看見以不平等待我的國家，而猶以爲不必抵抗者，便是不仁愛，便是反革命。

對帝國主義，與提倡農工運動，雖是兩件事，實是一件事。凡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人，必然與農工運動結合一致，謀農工的解放，即以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即所以謀農工的解放，反之，凡獻媚於帝國主義的人，必然厭惡農工運動，甚至藉帝國主義的勢力，以踐踏農工，他的目的，無非欲將農工有限的脂膏血汗恣意揮霍，以縱他無限的奢侈慾望，所以中國國民，今日祇有兩條路，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有人問我道，「革命派裏頭，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不會呢？」這當然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的。

我做這一篇解答以前，先要聲明的，我是專為革命派而說話，至於一般反革命派，滿肚子裏，都是反革命，却偏要戴着反共產的面具，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經營他兩重走狗的生活，我以為沒有和他說話的必要。

我為什麼專為革命派而說話呢？因為革命派心地是光明的，頭腦是純潔的，他所窮思力索的，是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於理論上有共同立腳點沒有？於實際工作上有共同努力之必要與可能沒有？我以為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

如今先取決於理論，我以為這是第一緊要的問題，然而這問題不用我們來解決，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替我們解決了。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慮到我們會因為這些問題發生困難。

故早已清清楚楚的，給我們一部民生主義，替我們解決一切困難，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道，『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接着說明社會問題之來源，並對於馬克思學說，與以極詳細之批評。第二講說道，『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我們聽了這些說話，如何還可以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衝突呢？有人說道，『看了總理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可知總理的思想，和馬克思不一樣。』殊不知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思想，總應該方求進步，我們對於馬克思學說，如果能學總理的態度熱心去研究，熱心去批評，這纔不枉為總理的信徒，為什麼我們裏頭竟有些人視馬克思學說如仇讐，甚至連馬克思學說也禁止閱看呢？這不是無理取鬧麼？又有人說道，『既然方法有分別，可知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到底不同，』但他為什麼不將第二看一直看下去呢？總理說道，『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特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甚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但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切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總理這番說話，真真是深切著明。根據着事實，來定方法，就和根據着地形和敵人的情勢自己的兵力來定作戰計畫一樣。由此可知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活的事實，要用活的方法來適應他，不能用死的方法。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有些不同，不但是當然，而日是必要了，如何可說是有衝突呢？而且第二講裏，對於我們：已

經諄諄告誡，說以爲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的，不但不知共產主義是什麼，而且不知民生主義是什麼。凡是總理的信徒，於此應該牢牢記着。我關於理論的話，所以如此簡單，因爲我平日主張，對於總理學說，應該細心體認，不應該孟浪解釋，以至犯了戴着色眼鏡的毛病，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說，總不能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

如今再說實際工作。

在說實際工作以前，我們應該先問，我們爲什麼要做革命黨人呢？我們可以答道，我們因爲耳朵裏聽不見人民痛苦的聲音，眼睛裏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一腔熱血，湧湧上來，願意將自己的痛苦，換取人民的痛苦，所以我們不怕勞瘁，不怕危險，不怕死，要做革命黨人。

我們應該再問，過們爲什麼要做總理的信徒呢？因爲我們既然想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想怎樣的解除人民的痛苦，總理的主義，便是怎樣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最好方法。我們抱着一腔熱血，要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依照總理的主義做去，不然，則此一腔熱血，無所用之，甚至用之不得其所，所以我們要做總理的信徒。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層，我們便應該知道，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一般旁觀的人不同。一般旁觀的人，或者漠然置之，而我們則引爲切己之事。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少數批評的人不同，少數批評的人，或者僅以爲有興味的研究資料，來做他有興味的批評，而我們則不只要研究他，要批評他，尤其要實現他，所以我派對於總理的主義，要做實際工作。

我們應該知道，世間一切事實，決沒有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是那時代和環境，有發生這事實之必要，然後這事實才會發生。假如沒有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史，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二百六十餘年來滿洲竊據中國的歷史，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所以總理主義，是應於時代和環境而發生的，主義發生以後，誠然有促進時代和環境的效能，而主義之所以發生，不能不說時代和環境，實使之然。所以總理之解決民生問題，要以中國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為對象，這是極明白的道理，也是極重要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

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是怎樣的呢？總理於民族主義，已講得清楚，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以下，更詳細的引申說明，中國因文化衰微經濟落後之故，而至於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又因受帝國主義侵略之故，而文化益以衰微經濟益以落後，馴至於不能保國並不能保種，所以中國今日，除了喚起國民反抗帝國主義，別無其他方法，這便是謂所國民革命。

由此可知國民革命這一作事實，不是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是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要求國民革命之發生，所以國民革命，才會發生。在這般的時代和環境裏，中國國民黨，負了擔任國民革命的使命，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裏，也因為看清楚了時代和環境的要求，所以來共同擔任國民革命的工作。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即使不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在今日所能作的，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這是時代和環境所賦予的使命，無可如何的，落後固不可，等也不可，正所謂過猶不及了。

中國現時唯一的要求，只是國民革命，總理的主義，便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根本方略，民族主義如此，民權主義如此，民生主義也是如此，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是研究批評，便可作為盡職，我們應該想着怎樣的把總理的主義，實行出來，去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使中國人民不至罹國亡種滅之禍，使中國的國家，在世界上，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僅看做極寶貴的，尤其要看做極切實有用的，我們與其談天說地，要怎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比之於耶穌孔子，我們不如切實實的將總理的學說，應用於革命之實際工作，因為這樣，纔是真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

以上所說，都是我們現時應該努力的，沒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是如此，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也是如此，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纔有工夫，共產與非共產的閒氣，我們如果做實際工作，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正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和敵人革命，那有工夫捱這些閒氣呢？

拿些例來說，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則對於馬克思學之批評，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或者感想不同，甚至於因此惹起爭執。其實這已是幼稚可笑的見解，須知道馬克思的學說，不但非共產派可以批評，共產派也不可批評，民生主義第一講裏所引的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便是一例，所以單就批評來講，不但共產派與非我派可以纏個不清，便是共產派裏頭也可以纏個不清。我們如果要做實際工作，則必定依總理所說，「我們解決社會問題，

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那麼，我們研究的對象，是中國目前的事實，對於這一種事實，要應用這一種方法，纔可以解決他，這裏稱有一定的道理，不可移易的，上頭說過，中國現時的唯一要求，是國民革命，便是因為中國目前有此事實，不能不用方法，所以即使馬克思復生於今日，也必然承認此方法的不錯。列寧是馬克思的信徒，而列寧對於中國革命，所指導的，與總理所指導的，差不多是一樣。由此可見革命的指導者，所見略同，這原因完全是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猶如是這種病症，便用這種醫藥。一般庸醫，學理不明，認症不清，對於病人的時候，往往七嘴八舌的亂說，高手的醫生，決不會如此，斷症用藥，只有少異，決無大差。中國今日，所為成爲遠東病夫，便是因為中了帝國主義的毒，除了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實無第二樣起死回生的良藥，所以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只要實實在在，做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便不愧爲總理的信徒，也不愧爲馬克思的後覺，至於總理和馬克思學說之價值咧，思想見解之異同咧，留在高等研究科的講堂裏，慢慢的研究，也並不爲遲。

再拿些例來說，國民革命的工作第一要喚起民衆，這是無可疑的。有人說道『馬克思的學說，是主張無產階級獨裁，總理的學說，是主張全民革命，截禁不同。』這若專就研究和批評來講，自然會做出許多的文章。若就實際工作來講，我們主張全民革命，是否要大多數之農衆工民爲基礎呢？中國平均一百人裏頭，有八十至八十五是農民，我們如果忘了農民，則一百人中，忘了八十人至八十五人，試問全些什麼，連半也說不上。這還單就農民來說，

若連工人算上，自然更不止此數。由此可知所謂全民革命，一定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了。有人說道，『主張全民革命，雖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而同時沒有忘了其他階級之利益，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則勢必至以其他階級之利益爲犧牲，』這也是似是而非之論。上頭說過，凡是解決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可見得無論何等學理，都要受時代與環境之支配，例如俄國革命，托爾斯基主張純以工人階級爲基礎，行無間斷的革命，以做成共產。列寧則主張引導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攜手合作，以集中革命的勢力俄國革命的成功，還是由於列寧主張之實行。這便因爲列寧之主張，能够適應俄國的時代與環境。列寧之引導農民階級農如革命。固然爲集中革命的勢力打算。而農民因參加革命之故，於農民階級的利益，得了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其參加革命，不爲徒勞，中國今日處於次殖民地地位，不獨農工階級，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即知識階級實業階級，亦反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如果知識階級實業階級覺悟到國民革命之必要而積極參加，其結果不但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其本身階級之利益，亦必得到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何至爲農工階級之利益的犧牲呢？由此說來總理主張全民革命，一方面固然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一方面沒有忘記其他階級之利益。不獨總理的信徒要熱心實行此主張即馬克思的信徒在中國現在的時代和環境裏頭也必以此主張爲至當最近胡漢民先生自莫斯科來信，述第三國際東方部的談話，即是主張中國現在國民革命，要求知識階級實業階級之參加，這正是一個顯著的例證須知道我們爲民衆而革命，同時要求民衆參加革命，使革之利益，歸於民衆這是必要的理論和方法

●所以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如果做實際工作，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還有一義，馬克思派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和總理主張軍政訓政，在名義上雖然不同，在實質上則為一致，賅括言之，不外以黨治國而已。●以黨治國、與開明專制，所以不同，其最大條件有三，（一）以黨治國，是領導民衆的；認明專制，是宰制民衆的，（二）以黨治國，是以民衆為基楚的；開明專制是以一人為基楚的。（三）以黨治國，是代表民衆的利益，開明專制，是代表一人的支配慾。有此三者。所以開明專制，不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以黨治國，則民衆費一度訓練之後，即能運需政權以舉全民政治之實，總理在革命運動時代，即制定建國大綱，將革命時期，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段落，辛亥之役，此種主張，未能見之實行，遂致決然辭職，民國八年，著建國方略，曾經於此，再三致意，當時總理懷着這種理想，因為未得實地試驗，全國人民，對之還沒有生出信仰，却料不到俄國革命，實行以黨治國之主張，與總理想的理想，如出一轍。所以總理當時非常愉快，屢屢對我們說，俄國革命，一定成功。而俄國革命黨人，讀建國方略，得知總理有此主張，亦不禁悠然生敬服之念。●總理與俄國革命，精神契合，此亦其一端。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手書建國大綱，將革命進行計劃，全盤披露。●軍政時期，掃除革命之障礙。訓政時期，施行政治訓練於民衆。憲政時期，將政權付之民衆。●這樣的有條不紊，對於現在之時代與環境，施行對症發藥的救治，同時創造時代與新環境。●一般舊黨員，如果覺悟到辛亥以來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一定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法，一般新黨員看見吾國革命實收以黨治國的效果。一定也盡心盡力按照建國

大綱做去。●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實際工作，總是一樣的。

如此說來，我們如果自己承認是革命派，自己承認要做實際工作，那麼，我們裏頭，決不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

我也知道，共產派裏頭，也有些不肖的分子，總理已經說過，『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員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總理這番說話，何等公正，可知道因共產派裏頭有些不肖的分子，而遷怒於共產黨，必爲總理所不許，若因非共產派在中國國民黨裏，與共產派共事，而遷怒及之，必更爲總理所不許。

自從總理頒佈了三民主義的講義之後，凡是革命派，無論爲共產派爲非共產派，都一致努力，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今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以至最近十月十一月間東江南路之戰，國民革命軍的將士，一堆堆戰死的尸骸，沒有共產派與非共產派的分別，已枕藉在一處，所流出來的熱血，已凝結成一塊了。●他們可以爲國民革命，同在一處死，我們何不可以國民革命同在一處生。●說到這裏，我的熱血，直湧上來，我敢毅然決然的說道，我們如果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綫上，而妄生共產與非共產的分別，以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者，決非總理的信徒

●今年中秋節之夜，我在黃軍官學校裏，有一場演說，其中曾引一段驢子的故事。如今

導引一段，有一頭驢子，肚子餓了，在青草地上，左望一片草，以爲不如右邊的好吃，右望一片草，又以爲不如左邊的好吃，如此反反覆覆的，左望了右望，右望了左望，一直到了餓死了，那青草還沒有到口。唉，總理的信徒，本已不多，有些做不度德量力以至於翻車的驢子有些做游移不定以至於自己餓死自己的驢子，還敢望能繼續總理未了的工作成就總理未完的志願麼？說到這裏，我也不忍再說下去了。

在國民政府特別黨部之演說辭

各位同志：今天我們在這裏開國民政府特別黨部的成立大會，論起這個特別黨部，原來是由大本營來的，不過從本年七月一號起，國民政府才成立。一路又因爲國家多故，直至今天才有這個黨部的正式成立，有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的選出，單就這點來看，我們對於黨的前途，實在是很有希望。我們想到這個國民政府的來由，大家都知道是由大本營改組而來，當日的大本營，是由我們的總理孫先生親自統率的，現在孫先生雖然不在，但是我們現在在國民政府服務的，不論秘書辦事員書記副官衛士，大都是跟隨孫先生，爲國民革命奮鬥多年的同志，其中還有些新的同志，也是因爲想竟孫先生生平未竟之志，入國民政府服務的，故此兄弟今天對於座中各位同志，更加有特別的感情，我們很是不幸，在半途上失了我們的總理，這在全國的民衆，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在中國國民黨的同志，也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但尤其比較別人加更痛惜的，可說是國民政府的同人，本府中的秘書辦事員書記副官，大多

數都是和孫總理日夕親近的，各位衛士更曾爲總理出過死力，自從在觀音山捍衛總統府，一直到總理去世，都不曾離開過總理的，故此今日凡在這裏服務的同志，於大家悲痛之中，便自然地生出一種互相親愛的感情，如果大家都一致團結，把國家的事情努力，弄個妥當，那末我們才可以對得住總理；否則我們大家都不爭氣，把總理的遺囑置之腦後，那就總理雖死也不能瞑目了。這一點我們在黨部的各種聚會，常常生出這個感觸，但在今天却感觸更深，我們試想想大本營爲什麼要改組國民政府呢？因爲總理已經死了，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實在是當然的，這一層原本不必等到七月一日，已經知到的了，也不必等到三月十一總理逝世之後，就已經知道了的。當十二年冬至十三年初間，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訂黨章時候，我們就老早已經知道，如果一日總理死後，黨政府和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都不會再有第二位總理的，這在黨章上寫得很爲清楚，大家是可以見得的。黨章裏面並不說是「本黨設總理一人」，是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爲總理」，由此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本黨除孫先生之外，是不會有第二個總理的。如果孫先生之外，還有總理，那末，黨章內應該說「本黨設總理一人」才是，爲什麼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呢？在這一條黨章上面，是明明白白的指出本黨所以有總理的緣故，是因爲孫先生是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革命的導師，自從興中會，而同盟會，而中華革命黨，以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四十年來，都沒有換過別一個人做首領的，所以他實是本黨一個天然的歷史的總理，如果孫先生不幸死了，那末在黨便不會再有總理，在黨政府，便不會再有元首，這

是理論上當然的事情。國民政府是受黨的委託的，黨的組織，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的組織，也自然同樣是採用委員制，是毫無疑義的。當着孫先生未死，我們可以一意跟隨着這個唯一的導師；孫先生既死，我們採用委員制，要使各人都盡其所能，以共同負荷總理所交付的責任，繼續國民革命未竟的工作，這就是國民政府所以成立的原因，

因此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是十分哀痛，一方面却是十分勇敢；所以哀痛的是孫先生既死，從今再沒有這樣偉大的總理做同志的導師，再沒有這樣英明的元首做國民的領袖了；所以勇敢的，是總理既把他四十年未了的巨大的工作，交付給同志，同志如果連一點勇氣也沒有，那末黨也可以從此消滅，國民革命也可以從此停止進行了。試問我們各位同志，是否原意看見國民革命的事業，就要跟着總理一同死去，如果不然，便應當振作起我們的勇氣，去擔負各項的工作，這是無可逃的責任啊！

自本年三月十二總理逝世。許多敵人以為中國國民黨也將要同歸於盡，不知總理生前對於這一層，是老早看見，老早曉得的了。總理在十三年時自己已知道不能夠久在世上，這也並不是因為總理的精神體魄已經支持不來，實在因為近來年所受軍事上政治上的苦痛，在在足以危險到總理的生命，座中同志許多是前日大本營的文武官吏，大家總見得總理這兩年來，近則受驕兵悍將貪官污吏的掣肘，遠則受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如何的可痛。老實地說，如果當十二年時總理一旦死去，中國國民黨或會一蹶不起，也未可料。為什麼呢？因為那時新的分子既一些不曾加入，舊的分子又日趨於腐化，就軍隊來看，真實忠心於主

義，忠心於總理的，都受驕兵悍將的壓迫，一點力量都沒有。那時的軍隊，那些是能夠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的呢？當時正恰有人謠傳總理逝世，如果謠傳果變成實事，那黨的前途，縱然未必就死，恐怕也不是今日的樣子了。

總理自從聽過這回謠言之後，所以在百忙之中，也要抽點時間，把他一生創造的三民主義講演出來。又把二十五條建國大綱，親手寫成，好叫後起的同志有所遵依；直到今年春間，他病將不起，更清清楚楚的在遺囑上把他生前所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都列舉在遺囑上面。其中建國方略，是民十以前做成的，建國大綱，是民國十三年寫成的；三民主義是他一面講演，一面叫同志筆述，再經他自己親自校勘過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則是他親自提出於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這些實在通通是總理遺囑，並不是從本年三月十一才寫起的啊。既然有了這幾種重要的遺囑，那末總理雖死，但他的精神却還存在，他到如今仍然可以做我們的指導。我們固然知道現在黨的生命，和黨軍之成立，國民黨之改組，都有極大的關係，但是比較這兩事還更重要的，實是在乎孫總理給我們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這幾件重要的著作既經完成，總理覺得他自己縱然不幸死去，也可以放心了。他的精神，他的主義，他的革命方略，都可以交給同志去繼承，那末，黨就可以不死了。有什麼憑據證明黨是不死，當本年三月總理尚在病中，黨軍肅清東江的戰事，已經傳到總理的耳中，這是一事。到本年六月譚組庵朱益之許崇智蔣介石諸同志，又把幾年來所痛心疾首的楊希閔劉震寰一起掃除，這又是一事。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一方哀痛，與一方勇敢，如果沒有總理的各種遺教也沒有同志去接受總理的遺教，這樣孫總理才真是死，黨也真是隨着總理一同死了。現在幸而還有這一幫忠誠的同志，願意拿他的勇氣去擔負艱巨的工作，拿少數窮困的軍隊，居然肅清東江的列軍，掃滅廣州的劉楊，使國民政府能夠成立，實都是一種勇敢的精神。

可是我們一面拚着命去做革命的工作，一面許多人却有點懷疑了。這幾個月來我們拿不妥協的態度，解散了許多軍隊，得罪了許多黨人，因之許多人以為我們是太過鹵莽滅裂，但我們平心靜氣想想，我們究竟是否鹵莽滅裂？我們的不妥協是從勇敢來的，勇敢是從哀痛來的。現在總理已死，我們總不想把總理的遺囑，成爲空文，我們總是想方法去現實遺囑上所交付的工作，那末，我們便不得不努力去奮鬥，求衝破這個惡劣的環境了。就拿十月三日我們把熊克武軍隊處分，這一件事來說，這是我們最近的不妥協的動作，因此便引起許多外面的同志，把我們詈罵，也許在廣州的同志，也一樣的詈罵，亦未可定。但是兄弟請各位同志試想想前幾天的情形如何，就可以了然了。如果熊克武的軍隊還在北江，我們現在能夠調兵去肅清南路嗎？前幾天南路軍事最緊急的時候，陳銘樞師長僅以三千餘衆，抵過萬的敵人，幾乎給敵人圍困住了。國民革命軍的第二師，要衛戍廣州，不能調勤，除掉第二三軍，還有誰可以去援救他？但設使熊克武的部下，還在連縣，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夠調動呢？當熊克武來到廣州時，我們已經查得他一方密電，他的所部由連縣開到含洸，一面由但懋辛駐港和陳炯明互相拉攏，幸而第二三軍能夠趕快把川軍解決。到前幾天譚組庵同志所部才可以是夜趕

到江門，朱益之同志所部才可以星夜趕到鶴山，南路的軍事至此才可以勝利。設使處置川軍略慢一點，恐怕現在的熊克武，已經蟠踞著廣州要說什麼武裝調停，招請陳炯明來省議和了，所以我們的不妥協是勇敢，不是鹵莽，而這種勇敢却又是從很深的哀痛中生出來的。我們既自認是孫先生的信徒，那末無論什麼困難的事，我們都敢去做的，國民政府所以存在也全在這一點勇敢的精神了。目下我們一方要和驕兵悍將打仗，一方又要和貪官污吏打仗；和驕兵悍將打仗，固然要拚命，但和貪官污吏打仗，也一樣要拚命的。你拿他一個貪官污吏，他就有許多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重重包圍着你，不許你動彈，我們如果不是根據哀痛中的勇敢，更如何能夠衝破這種惡劣的環境，生出新的生命來，

我們幹天下事情，總不外是理性和情感，我們沒情感便不必言仁愛，但我們沒有理性以節制情感，也將變成情面的動物，國事就要敗在我們的手上，總理的遺囑，更無法可以實行了。

今天在這裏開黨部成立大會，離總理的死還不到一年，回想前事，自然是無限哀痛，可是我們大家也要在哀痛之中，生出勇敢，拿起十二分精神把總理遺囑去實現，那末，我們才可以不負總理。現在有些人受了北京政府的蒙養，和安福系的指使，竟造謠言，說這遺囑是假的。當時孫先生家人和許多同志，都在場看見清清楚楚的簽字作證，假從何來，這本不必多辨。但這些人爲什麼要說總理的遺囑是假的呢？因爲有這遺囑，然後總理死而精神還在，就是總理的說話到現在還有效力，那些本黨的敵人，平日想殺害總理，想沒有中國國民黨去

做革命的工作的，到現他們所以希望的已成妄想，就要造出這一條中傷中國國民黨的毒計來，但是敵人縱然用盡他們的詭謀，到底是沒有法子能夠把孫先生的精神弄死的，座中各位同志，現在一塊辦事，大家都是跟從孫先生多年的，彼此實像兄弟一樣。這個國民政府原不是直接做事的，不像省政府和市政府都各有他的直接處理的本務，國民政府的工作，是在乎通盤的計畫，接受本黨最高的指導。如果大家團結，本着哀痛中的勇敢，恪守着總理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仍然可以常在我們的面前，領導着我們去革命，這就是本黨的元氣，若使這點元氣能夠繼續保持，我們便不枉與大元帥共事一場了。

今天在此演說，兄弟實在是感觸着無限的哀痛因爲我們的總理，已經不在。

歡迎懇親團演說詞

港僑懇親團諸君：今天諸君惠臨廣州，兄弟受國民政府委員會的委託，敬致歡迎之詞。本來今天的叙會單說歡迎兩字，還不足以表出我們的語意的。怎麼解呢？因爲政府是人民的公僕，諸君是國的主人。在政府辦事的人，正如一間商店的夥計，諸君才是商店的股東。現在各位來到廣州，就如股東到他的商店去查數，看看商店裏一班夥計，究竟有沒有偷懶，有沒有侵吞，有沒有做過不可告人之事，有沒有把這一盤生意弄壞。我們做夥計的，看見東家到了，特開這個歡迎會，一方是想報告過去的情形，一方就要求股東諸君的指教，不客氣的指教。所以歡迎兩字，還不足以盡政府委員諸人的意思的。說起中華民國，實是以人民爲基

礎，無論在國境以內，或國境以外的中國人民，他們對國家的資格都是一樣，他們主人的地位都是一樣。我們更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前，海外的同胞，對於民國的關係，比之國內的，實在更爲深切。因爲在海外的同胞，曾經親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所以他的認識，比較在國內的更爲清楚。所以民國之成立，實以海外僑胞之力居多。而各位就是僑居國外的，對於中華民國，是曾經負過很大的責任的，實可說就是中華民國的大股東。諸君此次到省，最先見着的，大概就是廣東的人民，現在還有許多苦痛，還未得到安樂的境地。而且諸君自己從本年六月廿四日以後，商務受很大的打擊，也嘗過不少的痛苦。但諸君最先到省慰問罷工工友，便是已經知道他們的痛苦，絕不減於各位，甚至深於各位。他們在港時許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到現在却遇冷沒有遮體的衣裳，遇餓沒有適口的飲食。在這種意念之下，我們可以知道，在港的僑商，和離港的僑工，都是受着同一的痛苦，都是爲同一的目的，而受同一的痛苦。這兩日間，各位和各工友互相慰問，互相勉勵。當知大家都是盡的國民天職，爲國家而受痛苦，所以彼此都感有無限的同情。兄弟敢說這不但是廣東前途的光明，也是中華民國前途的光明。（鼓掌）我們做夥計的，一方也見得東家這樣留心店務，當然更應該努力去做的，但一方也見到現在的店務，還未妥當，現在的招牌，還未大行，深覺慚愧無地。實在說，這幾年來廣東人民的痛苦太深了，受摧殘也太甚了，這豈特股東應該嘖有煩言，就是做夥計的也有許多難言之痛呢。現在兄弟就趁着這個機會，把有些各位還不能知道的事情，向各位作一個詳細的相告。我們今天應該最先想起的，便是民國十二年廣東的情形，實在可以說，是

入民國以來所未有的痛苦，是自前清以來所未有的苦痛。我們革命黨的志願，原想拿廣東做革命的根據地，以改造中國的。眼見着這種情形，其痛苦更加可想。今祇引孫先生當年的一番話，各位就可以明白，孫先生自十二年春間返粵，到是年冬間，曾召集各將領開過一次軍事會議。那時楊希閔劉震寰都有份列席的，孫先生出席後，足足有十分鐘之久，默坐不能出聲，大家也面面相視，覺得難過。後來孫先生卒於起立發言了，他說：「滇柱軍各位軍官，你們爲我趕走了陳炯明，是我所很感激的。我當時因爲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原不想回廣東的，我祇想在上海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就是了。但是各位都派遣代表到上海來見我，要求我回到廣東，並聲言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這是我更加感激你們的。那裏知道我們到廣東這一年來，各人都是戴着我的帽子，來糟踏我的家鄉。」各位想想孫先生這一番的話，是如何的沉痛！在我們二十年患難想從的黨人，更是感覺着如何的沉痛！後來孫先生更繼續着說：「這還不打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是願意犧牲的。如果把廣東糟踏了，而於中國有益，我便同家鄉的父老子弟，一齊犧牲，也在所不惜。但是把我的家鄉這樣的糟踏，而於國家還是毫無裨益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在同一處辦事。」當時揚希閔聽了這番話，臉上是有些變色了。他們回答的話是：「大元帥今天何必這樣生氣呢，我們都是服從大元帥的，生殺都惟大元帥所命，要我們怎麼樣，我們服從就是了。」隨後孫先生就提出軍權統一，財政統一辦法，他在席上都一律贊成通過了，可是會議一散之後，他們祇是說兩句「老頭子又發脾氣」就算了。自此以後，他們連軍事會議也不肯出席。民國十二年以來

廣東人民的痛苦，卒於無法挽救，痛心不痛心的？這種現狀之下，難怪人民攻擊我們革命黨人。我們那驕兵悍將貪官污吏，互相聯結，日日來做害民的勾當，弄到滿地煙賭，滿地盜賊，廣東人民如何不怒。而且那些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在一般人民看來，都是革命黨引他們的，更如何不怒。昨年廣州的商團，反對我們，我們也是明白他們爲什麼要反對的。可是他們當時偏找廖行超等來做居間調停，却真是顛倒之極。我記得孫先生當時曾有一次找商團各位到大本營談話，廖行超也都在座，孫先生當時痛心極了，就狠誠懇的對他們說：「廣東的壞，就是這般人不聽我的話弄壞的，爲什麼反要聯絡他們來抵制我呢，」孫先生說這一番話，是明知或者會惹起廖行超等人的反抗的，可是也不顧一切，無畏地說出來了。雖則如此，商團竟漠然無動于心，足以闖出一場大禍。但是孫先生在那時候，早已知道這些軍閥是靠不住的，他已經另外把革命的事業，建好了一個基礎，把中國國民黨改組了，把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造出些真實革命的人材，以備將來掃清那些反革命假革命的驕兵悍將。因此才有今年三月的肅清東江，才有今年六月的掃除楊劉，才有八月二十五日的捕拿驕兵悍將，才有九月二十日的解散東莞增城的反動軍隊，才有十月三日的消滅做陳炯明內應的熊克武軍隊，才有十月至十一月的再平東江，才有十一月的至十二月的肅清南路。目前急應做的事情，賴國民革命軍諸軍之忠勇，已算八九做成了。祇有雷州瓊州，現尙未下，大約不須一月，也可以完全收復了。可是這樣的連月用兵，實足以加增廣東人民的負擔的。各位此次來省，見有許多應做的事還未有做，就是因爲許多錢都已經用之於軍費啊。但是爲掃清這些驕兵悍將而

用兵，也是無法可免之事。試問不先把這等害民的軍隊掃清，各樣應興應革之事，又從何辦到呢？

這是驕兵悍將爲害之故，也不必說別樣，單拿多數下級兵士的生活來說，就可想而知了。記得他們這些兵士曾申一首歌兒：「你說我是兵，我却沒有餉，你說我是賊，我却有官長，」你說我是乞兒嗎，我却有枝槍。」由此，可知一般兵士的孤寒痛苦。廣東人現在所負的重擔，如果真爲一般兵士的餉項，他還值得，若大批的被這些不法軍官吞蝕，却就令人難忍了。所以我們才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實行財政統一，先把廣東的錢，收歸政府來公平支配。因此便要受驕兵悍將種種的牽製，不知冒盡了多少危險，才造成今日的局面。現在國民革命軍的口號，却是「不拉夫，不籌餉。」這兩句話。各位但看看這回東征，廣州有沒有拉過夫，各軍有沒有自由的籌過餉，就可以相信這個口號，並非徒託空了。這就是軍政統一財政統一後的效果。我們雖不敢說，現在在國民革命軍，已經做到完全能夠保護人民，但各位至少也應看廣州市內，現在已沒有軍隊羈佔民房的事情。計自從七月以後，由政府命令各軍遷出民房的，已有千餘家之多。從前以爲這件事是萬難辦到的，現在却已辦到了。雖然離廣州市遠些的地方，或尙未免有此等事，但各軍經過政治訓練以後，這個基礎已經做好，將來是一定更有進步的，第一級驕兵悍將既經肅清，第二級便是肅清土匪。這等土匪，持着槍就是盜賊，放下槍就是民人，實在是最難消滅的。這個土匪問題，很大很重，自然是非開闢實業不能根本救治。但說到開發實業，便非要人民和政府合作不可。（鼓掌）孫先生曾有兩句

格言還給我們：第一句是軍隊與人民合作；第二句是人民與政府合作。（鼓掌）但必先行第一步，乃可及第二步。現在可算是已經行到第二步了。照現在的軍額餉項來算，廣東的收入，雖尚未敷支出，但所幸的前時沒有預算，現在都已有了。自從預算委員會組織以後，到現在已經把預算做妥，雖則每月還欠四十七萬仍然未有着落，但比之從前無數可計的，却勝得多了。此後或將拿五分之四的軍隊，向東省外發展，留回五分之一在廣東守衛。廣東人到了此時，擔子便輕得多，保管有安樂的日子了。

目下國民政府固然是在草創時代，許多事都還未能夠做到的，但同時便有許多失職的軍人，無聊的政客，製造出種種的謠言。兄弟也不敢說座中各位東家，沒有這種疑感的，甚愿就在今天，向各位說明一下。謠言最利害的，就是說我們共產，實則吾國今日產業且無，共於何有？如果說句憤懣話，則他們造謠言的軍人政客，才正是實行共產。他們的共劃，是劃地皮之劃。聯合許多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同心合力去害國害民，這才是共產呢。（鼓掌）現在國民政府，却正是要保護人民財產的，第一步去驕兵悍將，貪官污吏，第二步去土匪。所為的無非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將來河道肅清，使土匪不能再有擾人民把各處人民的力量，充實起來，這時便可以說到開發產業。政府現在的計畫，先做保護產業，然後才做開發產業的。因為我們現在想請各位實業家來開發產業，也是說不過去。如許多人在路在舟上給土匪擄去，甚至有時連船也一並被匪搶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實業家回來且不敢，更從何得到開發實業呢？所以我們在政府辦事的人，終日都為此大事擔心，為此大事勞力，就用自己的血

，能博得人民的產業安寧，也都原意做的。（鼓掌）各位從此便可信共產是必無之事了。

謠言的第二種便是說我們聯俄。須知道聯俄是事實的。我們只要問孫先生爲什麼聯俄呢？是因爲俄國已經取銷了不平等條約。蘇俄自革命以來，便已決定對中國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直到民國十三年，便派加拉罕到中國，締結中俄協定，把所有以前俄皇時代與中國所訂不平等條約一概廢除。他既以平等待我，我爲什麼不和他攜手呢？去年十二月初間，孫先生到天津，已經臥病，張作霖一日約兄弟和他談話，他說：「從前我以爲孫先生是一個怎樣難商量的人，如今見過他，才知他這樣忠厚。我很同情他幾十年的奮鬥，還沒有成功，故很想替他幫忙，可是各國公使，却沒有一個說孫先生好話的，因爲他親俄呀！」他並且很誠懇的向我說道：「如果你能夠勸先生和俄國斷了關係，我是一定能夠擔保各國都和孫先生做好友的。」我當時答他：「這事很是容易，我們所以和俄國好。因爲他取銷了不平等條約，如果各國都取銷了不平等條約，也就是我們的好朋友了。」他聽了，已覺得不合口味。我知道當時外交團，是正在拿尊重不平等條約，做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的，因此更對他說明，歷年來我們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怎樣力爭不肯退讓的，就是爲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無論如何是不能放鬆的。可是他至此便已見得說話不接頭，不久且表示絕交的態度了。所謂臨時執政，依然在十二月十四日就以「外崇國信」四字，答應外交團的要求，把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置之腦後了。這就是今年五卅以後各地慘案的來由。軍閥之不足與言救國，也就從此完全證實了。我們須知道國際之間，須先要平等才可以說到親愛。主人之於奴隸止言恩惠，不言

親愛，就是因爲彼此本不平等。兄弟朋友夫婦以能說親愛，就是因爲彼此平等。他們列強既以不平等待我，更何有親善之可言？俄國既以平等待我，我又爲什麼不可以和他親善？這都是很清白的道理。如今更說明爲什麼有許多俄國同志來到廣東，來幫我們革命呢？如鮑羅廷先生，我們請他做高等顧問，出席於政治委員會，他在政治委員會裏，真可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苦痛也和我們大家同受，有患難也和我們大家同當，實是很難得革命同志。反對黨的人，如果見得我們措施不妥，儘可直接攻擊我們，爲什麼不攻擊有表決權的政治委員，却去攻擊祇有發言權的同志呢？還有一說，俄國的同志，究竟爲什麼要來幫助我們呢？現在且引各國以前的革命事實說一說，各位便可以明白。意大利的中興三傑，大家都知道就是馬支尼，嘉富爾和加里波的。加里波的是意大利的一個革命黨，他曾經亡命到南美洲，幫助南美洲的人民革命的。他並且任過南美洲革命軍的總指揮。爲什麼呢？因爲說到正的革命，原是不分國界的。我們中國古語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就是革命黨的精神。

又如美國之抗英獨立，實得法國革命黨獵斐德的助力不少。獵斐德初時因爲不容於法國的專制政府，亡命走美，他就幫助美國人革命，曾經做過美國的大將軍。後來美國革命成功，美人且替他鑄造一個銅像，送到法國去紀念他。同時他們在美也鑄銅像來紀念他。而且美國每逢獨立紀念的日子，做總統的還親到像前致祭。這位獵斐德將軍死後美國人還是這樣熱烈的紀念他，但獵斐德又爲什麼這樣幫助美國呢？因爲他是一個革命黨，他在法國革命不成，才亡命到美國，到美國他就幫助美國的革命。他一方面固是想拿自己的革命精神，幫助

美國革命的成功，但同時也想拿美國革命成功的精神，去促進法國革命的成功，果然法國不久也因爲受美國革命的影響，大革命也爆發起來了。俄國的同志，既在俄國革命成功，所以如今也就來幫助中國革命，正是一樣的道理，不過一個是自己未曾成功而去幫助人，一個却是自己已經成功而去幫助人，但同樣都是革命黨的本色。俄國同志因爲自己已經成功，更來幫助中國以求將來世界革命的成功，這有何不可呢？以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軍事行動而論，他們英法兩國可以聯軍打廣東，犯北京，燒圓明園，庚子之役，他們且可以八國聯軍入北京推瓦德西做元帥。以經濟侵略而論，他們可以組織英德法三國銀行團，加入美國，成四國銀行團。加入日俄，成立六國銀行團。及後美國退出又成五國銀行團，他們聯合起來，用共同一致的步驟，來吸收中國的人脂膏，攫取山東江蘇直隸河南四省的地丁錢糧，及全國鹽稅關稅做擔保，就可以行所無事。我們聯合一個革命的國家，在抵抗外國的帝國主義，就要大驚小怪起來嗎？再拿日本來說，日本的法律改良，得力都是於法人波梳拉度的。波梳拉度是法國一個大學教授，也是一個法律名家，定到日本法律學堂來授課，有一天正在上課，聽得外邊日本官吏審案時候笞刑的怪聲，立即聲言，日本倘不廢肉刑，他就不再上學堂的課。後來卒使日本廢除了一切的肉刑，其他海軍則用英人做訓練，陸軍則用德人做訓練，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今俄國同志到來幫助我們，沒有享一些報酬，我們有時多謝他們一句，他們還說他們是爲世界革命，正像我們爲國家革命一樣，不必說甚麼多謝，這是純以革命的目的共同努力，有甚麼可疑之處呢？近來上海的報紙，又來造謠，說馮玉祥和鮑羅庭先生訂立

什麼密約，但經北京方面一個反證，他們的伎倆便立即無所施其巧了。我們光明磊落的革命行動，雖然暫時會受人家的譏諷，但終於不敵事實的反證的。總而言之，我們與俄國攜手，是因為要促成中國的革命，同時要促成世界的革命。這是兄弟敢在今日對各位中華民國的東家說句負責的話，並且請各位東家可以自己調查，知道並不是假話的。

以上所講，第一是對於共產謠言的解釋，第二是對於親俄問題的解釋。兄弟也不敢說各位就一定能夠原諒，因為我們自己黨人中還尚有種種說話不能原諒我們的呢；但無論怎樣，各位究竟要看看我們的事實。現在的廣東，的確是還未太平，這是無法可以向各位告無罪的，不過也要各位知道我們尙是人，我們尙是革命黨，尙是一個肯犧牲自己去爲人民，犧牲自己去爲中國的革命黨。如果各位見得我們有錯，就要加以指教，見得我們有艱難行不通的地方，也就要加以幫助，這就是我們至誠懇的希冀了。

我們現在的計劃，最大的就是要先把廣東做好，然後再及於全國。講到全國政局，軍閥之打倒是必然的了。昨天兄弟已接到天津的來電，李景林確已失敗，馮玉祥的軍隊，確已入了天津，北洋軍閥，現在實已入了瓦解的形勢了；今後最重要的，就是『建設』，如果廣東的海南問題，一經解決，我們便要實行軍民合作，先求做到保護人民財產，然後做到開發實業，但求能夠使此一兩年內，廣東的民生，漸趨舒展，那就算我們不至白做一場了。

兄弟還要向各位說明的，就是中國國民黨的農工運動。有些人說我們對農工就說保護農工利益，不理商人，對商人却又說保護商人，不理農工，設使兩方的人都一齊在座就要無話

可講了。但這是不是事實呢？請問現在的罷工工人，我們有沒有對他們說不理商人呢？我們現在對各位的話，又有沒有說不理農工呢？都是沒有的，因為我們現在要幹的，是國民革命的工作，是要保障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將來國民革命成功，就人人都得利益，所沒有利益的，祇是甘願犧牲的革命黨人罷了。就實際來說，中國的農工商，實是共同休戚的，即如現在急要實現的是取銷不平等條約，這裡頭最重大的便是收回海關，試問收回海關，於商人研究有沒有利益呢？當民國八年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上海商會有一個代表姓榮的到巴黎去，他直說別的事他們商人都必談，他們單要說的便是海關，因為海關權給外人拿去了，外人的貨物，納稅倒少，自家的貨物，納稅倒多，這如何能夠和人家爭衡呢？而且我們的對外貿易，是隨人愛抽多少稅就多少，人家運貨到我國，却要受各國協定稅率的限制。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商人簡直是永無發達之望，所以他們也就出異力量到和會去爭回中國的海關權。如今我們並且找農人工人一齊去爭這個海關權，去謀求取銷一切不平等的條約，這明明是大家都利益的，還有什麼可疑之處呢！

更說最近的較小的事，如復工問題，省港罷工工人所力爭的，是中國人在香港有集會結社居住言論出版的自由。這也是全體華僑之事，並非單為工人的。至於居住的自由，是指能住在山頂的洋樓居住，更完全是有錢財的「闊佬」才能够享受的，簡直是不關於工人的了，工人罷工數月，捱饑抵冷，實在還是為有錢的「闊佬」來受苦，這豈不是中國人無論何界都休戚相同嗎？在孫先生所著的建國方略，清清楚楚的寫明發展實業的計劃，分別各種實業的性質

，有些應該由國家經營的就屬之國家，有些應該由私人經營的就屬之私人，國家並且要用穩固的法律，來保障經營的實業，所以我們主張農工運動，實在並沒有意思去壓迫商家；不過目下農工的地位和生活，却一定要給他們增高，這是凡屬人類都應該有的生存權，實是天經地義，斷不能說農工就是生來要做奴隸之理。現在中國的人民，農人足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怎能夠不幫助他們呢？

總而言之，我們全國人民，不論農工商學兵，能夠一齊合力推倒帝國主義，取銷不平等條約，便大家都有好處，政府才有錢辦事，人民也家給人足，農工固然有益，商家更是有益，這條國民革命的大道，為何不大家一齊走上呢？

我們常常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孫先生已經用他四十年的學問和經驗，替中國闢了一條光明大道，創造了三民主義，定下了建國方略，又建立了與人民合作的軍隊，做國民革命的前驅，我們跟着這條光明大道來走，自然就可以得着全中國人民的幸福，這是我們後死的革命黨人，一息尚存，也是拼命去幹的。

我們做夥計的已經對各位東家，盡力說明這盤生意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各位從前有誤會的或者總也明白許多，現在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各位的教誨。

今天所講，都是中華民國前途的問題，我們願大家都各本真誠，在這青天白日之下，作一番推心置腹的商榷。

在二次代表大會對於接受總理遺囑案之報告

代表大會各同志：今天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共同向大會提出一個『接受總理遺囑並努力履行之』的議案，委托兄弟把接受總理遺囑的經過報告一下。自去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理在北京協和醫院受手術後，已發現是一個不治之症。當時在北京的各同志聽見這個不幸的消息，大家都覺得此後各位同志身上，要負一個很嚴重的責任。所以那天晚上，即開政治委員會會議。這個政治委員會，原本是總理在廣州時所組織，總理自己做主席的。但當總理將入醫院的那一日，知道病勢不輕，不能躬親庶務，而許多政治委員都不在北京，胡漢民廖仲愷譚同志在廣州，戴季陶邵元冲諸同志在上海，祇兄弟一人隨在北京，當日總理特加委于右任，吳稚暉，李大釗，李石曾，陳友仁，做政治委員。那天晚上，政治委員會諸人商量了許久，都以為應該趁總理未臨危之前，求他有一個遺囑，好交付同志遵守。大家對於這層意見，是經一致贊成的。但經過一個月，這事還沒有決定。因為大家對於總理的病，總還有一線的希望。雖然經醫生說過是完全沒有希望，但大家還覺得總理的精神強固，抵抗力總比較別人強，就令不能夠完全痊愈，總可以抵抗久一點，或者能夠延長一年半載，或兩三年的生命，也未可定。如果對他照直說明，是不治之症，使總理心理上預備逝世，會消滅他許多抵抗的精神。因此大家都決定非到最後的時間，不能夠對他直說。由一月二十六日一直到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差不多天天都對醫生說，如果覺得總理臨危，須告訴我們，給我們進去說話，醫生也是答應我們的。到二月二十四日的上半天，總理覺得很辛苦，已有些支持不住的樣子，醫生也告訴我們，如要問總理，就在這一兩天要問他了。過此以後，恐怕他就要離

開我們的了。那時，我們萬不得已，止有先取得孫夫人的同意，請他出了病房。然後孫哲生，孔庸之，宋子文三位同志，和兄弟四個人，一同進了病房。總理當時見了我們四個人進去，就叫我們進前，似乎有一點覺得自己是不起的意思。隨即問我們到來有什麼話要講？大家都是還不敢直說的。兄弟當時很委婉的對總理說：『當一月二十六日那天，先生進了病院，許多同志，都責備我們，要請先生留些說話給我們。先生的病好了，便無所謂。設使不好，我們還可以聽先生的教訓。我們知道先生是能夠和病魔抵抗的，我們是願意幫助先生抵抗這些病魔的。不過也想要在你精神好些的時候，請你留些說話給我們，在十年二十年之後，也可以受用。』總理當時說回答話是：『我生是有話說的，我死便由你們去做，也不必我說了。』

我們說答總理：『還是願意聽先生的話』總理說：『我如果留下說話給你們，是於你們有許多危險的，現在許多敵人正在圍困着你們。我死之後，他們更向你們進攻。如果你們強硬對他們，是危險很大的，我看還是不說的好，好教你們能夠對付環境容易一點。我要說出，你們便很難對付險惡的環境了。』兄弟回答他：我們曉得大部份同志，都能够聽先生的話，什麼危險什麼生死問題，我們都不管。先生教訓我們很久，也可以相信我們是不怕危險不怕敵人的。』先生聽了這話以後，閉着眼睛，點着頭，表示贊成我們的意思。我們更對先生說：『你要說什麼話，隨便就好，也不必太費心。』總理說：『我已經著有許多書了。』兄弟答：『是的，你著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我們都要寫上去的，但還想先生有些總括的話。』兄弟記得去年一月一日，先生由天津進京時吩咐過幾句話。

那時先生的精神尚很好，他親口授兄弟寫下的，是他四十年革命之目的，是在求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這句話，是用傳單替代演說散給民衆的。除這句話以外，先生此時還對我說明革命的方法，要特別注重兩點：第一點是喚起民衆。第二點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兄弟聽完了這幾句話，就馬上把他記起來。因為時間緊急，又在他面前寫起的緣故。所以所寫的字，很是草率。寫完之後，讀給先生聽過，他點頭道「好呀」，又預備了一張家事的遺囑，一字字的由兄弟念過之後，總理也點頭說好。我們原想即時就請總理簽字的。但是孫夫人在房外正在哭聲很哀，總理就說，「你且暫時收起來罷，我總還有幾天的生命的」。我們因此，不敢再請總理，就把這張遺囑摺好，放在衣袋裏，退了出來，隨即到政治委員會報告。當時有各位委員在座，他們有些是早已在外面探望，都聽見我們的說話的，就請他們一齊簽字證明。由兄弟存在身邊，等到他危急時候，纔拿出給他簽字。自從這天以後，再過了幾天，先生的病，已絕對沒有希望的了。不過大家同志還是希望未絕，有一點可以延長先生的法子，都無不用到，所以天天都進人參湯。這個時候，總理天天是這樣的過去。直到了三月十日的晚上，先生病狀太不好了！沒有法子再支持了！到十一日早上，何香凝同志對兄弟說：「現在不可不請先生簽字了」。但頂困難的，是有什麼方法，使孫夫人能忍耐些時呢。因為先生生平是最仁愛的，他若是見了夫人在旁邊哭，他一定是不肯簽字，致令夫人傷心的。因此何香凝宋子文兩位同志，都對夫人把這個意思說明。夫人那時也說：「到了這個時候，我不特不願意阻止你們，我還要幫助你們了。」何香凝同志，得了宋夫人答應之後，就趕快

叫兄弟把兩張遺囑都拿出來，就用孫哲生同志身上的墨水筆交給先生，先生當時因爲手力很弱，有些顫動不能自持的樣子。夫人就用手托着先生的手腕，給先生容易簽字。先生所寫的字，雖然腕力很弱，但却是寫得很清楚的。兩張遺囑都這樣簽完了之後，另外還有英文秘書陳友人同志起草致蘇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讀了一遍。先生聽過後，再用英文簽字。以上都是十一日早上先生把遺囑遺書簽字的情形。到了那天下午，先生還有很長的話對孫夫人何香凝同志和好幾位同志說的，實際上原也和遺囑一樣，不過是沒有先生的簽字，故不能當作正式的遺囑。至於他那天回答我們的話，兄弟已經報告於政治委員會的，不過因爲沒有簽字，所以也不能當作正式的遺囑。現在祇能拿這一張先生親筆簽字的遺囑，做教訓全體黨員的最後說話了。十一日晚上八點鐘，先生斷斷續續的，還說了許多話，或用中文，或用英文，頻頻說的，就是『和平！奮鬥！救中國！』這幾句。到是晚十二點鐘，醫生告訴我們，先生的脈已散，快就要去世了。你們要注意了。先生這時曾有一次，似乎要說話的樣子。孫夫人聽得是叫兄弟，便立即叫我近前，我按着他的手，已是不能動彈了！到三月十二日早上，先生就果然棄我們去了！我們便把遺囑用鏡鑲好，放在先生的靈前，叫大家共見。後來在北京料理喪事完後，把這張遺囑送回廣州，在一處嚴密謹慎的地方，深深藏着。如果各位同志想看看的，可以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商量，如想攝影也可以的，自從得了總理遺囑之後。到去年五月十六日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接受總理遺囑，發出鄭重宣留。並且通過各黨部每次開會，都要恭誦總理遺囑。這就是本黨通過接受遺囑的經過。現在第二次全

國代表大會，既經開會，我們該應向大會報告的。還想請求大會對於接受遺囑這一件重大事情，有一個鄭重的議決案。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共同提出議案的條文，是：『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謹以至誠，接受總理遺囑，努力履行之。』

望各位同志加以通過。兄弟今天所說明的，是總理遺囑經過，至於遺囑的意義，不必兄弟說明了。

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在孫文主義學會成立會之演說詞

諸君：今天是孫文主義學會舉行的典禮，我們爲什麼有這個孫文主義學會呢？因爲現在孫先生雖然死了，但是孫先生的主義却没有死，孫文主義學會，就是要將孫先生不死的主義，拿出來給各界諸君認識的。我們知道孫先生當乙酉中法戰敗之年，便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後來到乙未年——就是甲午中日戰後一年——孫先生舉行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不幸失敗，就亡命到歐洲，在歐洲這幾年間，一面研究各國政治和社會的狀況，一面結交各國的賢豪，因而知道單獨政治的革命，還不能夠解決中國的前途，必定連帶社會的革命，才能夠使國民得享受真正的幸福，因此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再加上民生主義，就成功了三民主義。到乙巳年，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就把三民主義成爲一黨共同信仰，當時同盟會的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四句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就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就是民生主義。至於當時宣傳三民主義的機關，

就是在東京出版的『民報』，自有民報出世，國人才漸漸曉得什麼是三民主義，中國才成功了辛亥的革命。到民國元年同盟會改組做國民黨，當時孫先生是很不滿意的，故此對於國民黨的總理一職，也表示不願意幹，因為那時國民黨的黨綱，實不過是一種社會政策，已經把民生主義的真諦，完全喪失了，這時的國民黨，止可說是一個普通的政黨，已經失掉革命黨的本來面目了。自民二革命失敗以後，孫先生鑒於黨人前時的錯誤，就着手改組為中華革命黨，重新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規定於誓約。直到民國九年，粵軍自漳州回粵，孫先生在上海和各位同志商定，才改稱中國國民黨。直到現在，中國現在政象癥結，我們看得很清楚的，是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軍閥的摧殘，所以孫先生在民國十三年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大會宣言中，首先說明中國現在的狀況，次解釋三民主義的內容，次敘述本黨的政綱和政策，這個宣言由孫先生親自提交大會通過，就成為本黨全體黨員的指南針。宣言發表以後，孫先生更時時研究，怎樣把黨綱政策，見諸實行，後來更覺得自己的精神體魄，都有些不像從前，所以雖在政事很忙的時期，仍然在此抽出一點時間，每星期都有一次講演三民主義，編成三本書交給我們，指導我們一條光明的大路，有這幾本書在，則先生雖然死了，他是仍然可以常常在我們面前領導我們中國革的青年，得此然後可以日益團結，日益奮發，而不至走錯了路徑。孫文主義學會今天成立，便是信仰孫文主義，研究孫文主義，宣傳孫文主義，實行孫文主義的一個團體，將來由這個團體，更可以把這個主義供獻給全國了，我們現時特認定救中國的惟有這個孫文主義，如有妨碍孫文主義的，我們便一定要盡力驅除這種障礙

，我相信孫文主義學會諸君都是很純潔的，都是要跟着孫先生交給我們的光明大路向前走的，我覺得中國現在被帝國主義者這樣的壓迫，沒有別的安慰，止有努力於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使將來中國可以得到自由獨立的境地，就是我們莫大的安慰。兄弟特於今天孫文主義學會成立之日，和大衆高呼。

孫文主義萬歲！

孫先生不死，因為孫先生的主義，便是孫先生的生命，我們要繼續孫先生的生命！

（完）

附 錄

汪精衛親撰之廖仲愷同志傳略

自廖仲愷同志爲國民革命而犧牲之後，報章所載其軼事，據廖夫人言，多有不盡不實，即梁紹文君所撰者，雖由胡漢民君先生口述，亦有不詳盡之處，現汪精衛同志特再親爲之撰，并由譚延闓同志敬書，爲之刻石於惠州廖仲愷先生紀念公園內，以垂不朽云，

文曰先生姓廖氏，諱恩煦，字仲愷，以字行，廣東惠陽縣鴨仔步村人也，父竹竇，商於美，雖去祖國，其教子女，輒以國學爲先，先生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三月十日生，生下七年始歸國，於國學已明徹，而西學亦涉其藩籬矣。由是益致力，學亦益進，年廿二，娶夫人何氏香凝，伉儷至篤，其時中國積弱，外侮洊至，士多發憤，求學於外國，先生有志於此，而費無所出，夫人慨然，出私蓄，資之行，遂留學日本，越年，夫人亦至，相與砥礪學

問，先生初入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繼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其平生長於經濟理財，導源於此也。日俄戰起，中國危殆，益不可終日，乙巳之歲，孫先生文至東京，集十七省革命同志，組織中國同盟會本部，先生夫婦先後與盟，其盡瘁於國民革命自此始。旋奉先生命，潛赴天津，有所謀畫，其時學未成，棄去無所顧惜。及謀畫不就。乃復回東京，卒所業，始歸國，居前清吉林巡撫陳昭常幕中，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各省響應，九月，廣東光復，先生遂歸廣州，司財政，鼎革之際，財政棼如亂絲，先生從容整理，不數月收支適合，迄於去官之日，庫有餘財焉。癸丑革命軍敗，孫先生亡命日本，先生從，中華革命黨成立，孫先生善理財，使與張君人傑回掌財政。五年，袁世凱死，從孫先生回國，居上海。六年，督軍團謀爲變，毀約法，解散國會，孫先生集海軍將士議討之，遂率第一艦隊至廣州，開大元帥府，以議法爲天下倡，而西南羣帥。各持異端。齟齬之無所不至。七年孫先生遂辭職，還居上海，始從事建國方略之著作，先生感於孫先生頻年不獲行其志，由國人理喻者寡，始肆力於宣傳，乃與諸同志創建設雜誌，出所學以質當世，其所譯全民政治最有名，孫先生於民權主義講義中，曾稱道之。九年粵軍自漳州回師，復廣州，迎孫先生歸。十年五月孫先生被舉大總統，先生以廣東省財政廳長兼財政部次長，旋爲陳炯明所忌，辭廳長職，專握財政部事，陳炯明叛志漸萌，先生覺之植桂管新定，先生乃力贊孫先生出兵北伐，而銳以戰餉自任，孫先生自是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統大軍，駐桂林，無匱乏之憂，先生力也。然以是益爲陳炯明所忌，所以窘先生者萬端，欲阨北伐軍俾不得成行，四月杪，孫先生遂自桂林回師，免陳

燭明職，復以先生兼財政廳長，不旬日，發帑三百萬，遂出師江西，戰連捷，定贛州，垂克吉安，而陳燭明以六月十六日舉兵反，先一日遣使飭先生至石龍，囚之，六十二日始釋，先生遂復至上海，從孫先生，先是孫先生深念民國以來禍亂無寧日，雖軍閥肆虐，而帝國主義實操之，願帝國主義方宰割世界，無能抗者，及俄國革命起，則大慰，以爲得良友。十一年冬，俄國公使越飛至上海，謁孫先生，議論相契合，孫先生遂命先生偕越飛赴日本，越飛養痾熱河。先生晰夕與相聚，議論上下古今，自是先生始決意，力贊孫先生結連世界革命者，以與帝國主義抗矣。十二年春，楊希閔劉震寰以兵自白馬東下，假孫先生名義，討陳燭明，走之，遣使至上海，迎孫先生蒞廣州，然楊希閔劉震寰實無意革命，凡孫先生教令，恐陽奉陰違，日惟爲暴於民，以歛財自肥，孫先生意怫甚，念帝國主義與軍閥勢旣益猖獗，而廣州號革命根據地，乃名實相反若是，非舉中國國民黨改絃更張之，不足以振頹靡之氣，非創黨軍，不足以掃去障礙，使黨之主張得以實施，乃於十二年冬，布教令，改組中國國民黨，先生贊襄最力，十三年春，旣被命爲中央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長，遂辭廣東省長職，悉其力從事，復與蔣君中正同被命籌備黨軍軍官學校於黃埔，蔣君任校長，而先生任黨代表，殫精焦思，以期有成，艱難百折非所恤，蜚語萬端非所顧，迄於陸軍教導團成立，中國國民黨始得一能奉行黨義之軍隊，而國民革命始有進行之機倪矣。是年夏間，先生復任廣東省長，秋，廣州商團謀爲亂，先生欲先發制之，格於事勢，不得行，遂去職，商團旋叛，討平之，而曹錕吳佩孚亦爲張作霖所敗，孫先生輟北伐之師以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天下，躬自北上，

促其實行，以各軍暨各軍新設學校黨代表之任，屬之先生。其時陳炯明聚兵惠潮梅，乘孫先生北上，謀來犯，先生乃與蔣君中正，激厲黨軍，務以一戰除廣東人民之痛苦，雪吾黨之恥辱，十四年春正月杪，孫先生在北京疾篤，陳炯明悉師攻石龍，黨軍合粵軍即擊，大破之，進至平山三多祝，所向皆克，遂復海豐，定汕頭，羣賊披靡，東江患平，孫先生卒於三月十二日，卒之前猶及聞黨軍捷報也，爲東江羣賊未敗時，楊希閔劉震寰潛與通謀自全，及賊勢熾，不自安，乃結唐繼堯，使率師東進，謀以廣州爲內應，六月，黨軍暨粵軍自東江開師，合湘滇軍討平之，蓋自是假藉革命名義盤據廣州之元惡巨愆，始掃除以去，廣州始得爲革命之根據地矣，先生於此兩役，運其智勇，使將士各得所展布，而農工民衆，亦感先生至誠，悉全力於國民革命前驅，故成功之速若此，楊劉之亂，以六月十二日平定，而廿三日沙基慘殺案已作，帝國主義利用軍閥爲亂不得逞，乃直接屠殺中國人民，其勢至岌岌，先生既指導民衆與帝國主義反抗，復努力成立國民政府，以求軍政財政民政之統一，以一身兼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財政廳長諸職，由是驕兵悍將貪官污吏皆以先生所爲不便於己私，遂勾結帝國主義，爲之鷹犬，以謀不利於先生矣。八月廿日，先生偕夫人乘車赴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中途，遇監察委員陳君秋霖，載與俱，既至會，入門升階，兇徒五六人突起狙擊，中要害，遽卒。陳君亦被創。後先生二日卒。嗚呼！先生爲革命盡力二十餘年，最近所成就，其裨益尤大。自孫先生歿，而先生更以一身繫革命前途之安危，先生之死，非第中國之不幸，世界革命之不幸也。先生生平勤學，尤勇於任事，其自奉廉約，二十餘年如

一日，其嘉言美德，後死同志，將纂輯成篇帙，併其遺文，以餉當世。茲僅紀其犖犖大者。夫人何氏，與先生同心一德，女夢醒，子承志，亦能繼志述事，先生既歿，後死同志，念先生翊贊孫先生。功甚偉。議決，葬先生於南京鍾山孫先生墓次，復從何夫人請，暫厝於廣州。朱執信先生墓左隙地，以先生與執信志節同境遇亦同也，十月十四日，國民革命軍既復惠州，於公園及鴨仔步村立碑紀先生功，且以永其哀思，先生之精神，將與岩石同其不朽焉。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六日汪兆銘敬撰譚廷闈敬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35B

請看

國民新報

本報自去年十二月五號起擴充篇幅爲中文兩大張英文一大張副刊一張
副刊請

陳啟修魯迅張鳳舉三位先生編輯爲便利閱者起見更分英文中文中英合
併三種發行如承訂閱請與前外延壽寺街三十號電話南局四八七〇本報
接洽可也

634631

8-1394